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專輯前言

楊儒賓*

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張亨老師於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安祥捨世，壽八十有六。張老師生於戰亂之中，長於流離之世，雖飽經憂患，歷經坎坷，然自任教以來，推動學術之心與深化教育之念始終未懈。逝世消息傳來，師友多不捨。張老師一向關心文哲所之發展，與所內同仁之學術互動甚深。本所感哲人之日遠，典型猶存，因設專輯小組，籌集海內外先生同儕之追悼文十五篇，編為專輯，以表追思。格於篇幅，中壯輩學生之紀念文，另行刊於「永懷張亨老師」網頁，連結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hroklga571/home/ntucl/past>。

張亨先生事略

先生諱亨，山東泰安人，民國二十年生。小學就讀家鄉的泰安國小，畢業後，續讀泰安中學。求學期間，時值動亂。先是對日抗戰進入末期，國府的焦土抗戰政策仍續推行。等抗戰勝利，國共內戰緊隨而起，山東位處雙方爭戰前沿，烽火交集，全省動盪，阡陌難安。先生於動亂中，先於濟南就讀第五臨時高中，繼而南下杭州，轉讀國立聯中。爾後，隨校輾轉流離，經廣州，後至澎湖，乃暫得安息。其時九州動盪，綱紀不張，掌權者多便宜行事。澎湖軍事首長對流離寓居之山東聯合中學之學生多有不法之要求，強硬鎮壓，終釀成嚴重之政治案。先生身處其間，雖未直接受害，然耳聞目擊，多有所感。爾後教學研究，行文論學，因而多注重知識與具體生活之關連。民國三十八年下半年，渡海參加臺灣省教育廳為流亡學生所辦之特考，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師大）國文系，畢業後，服完兵役，並任

*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教中學兩年。民國四十五年，考進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兩年後碩士畢業，論文題目為《荀子假借字譜》，由戴君仁教授指導。同年留校服務，受聘為臺大中文系講師。五十四年升等為副教授，六十年升等為教授，八十六年退休。退休後仍於中文系繼續開課，直至臨終前數年，一生心力可謂盡瘁於臺大中文系。

先生任教後，曾於民國五十七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助，訪美兩年；七十四年，獲傅爾布萊特獎支持，至威斯康辛大學訪學並授課。戒嚴末期，為就近照顧慈母，以香港地利之便，曾至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近一年。任職期間，亦曾應邀至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講學。上述事件為先生與國外學界交往之簡歷。若短期開會之事，則不列入。先生雖為中文系教授，浸潤古典甚深，然論學每以固執不化為憂，行文亦多側重古典與今義之相互融釋。先生之遊學海外，非僅出自拓展見聞之想，亦源於對古典知識有與時俱進之認識。在戰後中文學界中，若先生之勤於汲取新知，古今交會者，蓋亦鮮見。先生山東人，一生的歲月大部分在臺灣渡過，其事業與臺大共終始。然觀其一生之遊歷與撰述，可知先生關懷始終在更寬宏的人文精神之發展，遠非一校一地所能拘囿。

先生服務臺大四十年，於行政職務，素所絕緣；除學校教學活動外，與社會諸多事務，亦乏參與。先生固教育人也，教師是先生唯一之事業。先生非不知行政職務可有益於教育理念之推動，先生亦非不知社會服務固儒者安身立命之所基，不得以外緣不相干之事務視之。然先生面冷心熱，一生對公共事務，在不涉個人利益之情況，實多有支持。民國六十一年，國立編譯館有改善中學教科書之議，先生實質上主編執筆其時中學國文教科書之事。之前的中學國文科教科書多收錄政治人物之文章，非關國語文之培養；且白話文偏少，本土文學家之作品尤為少見，古典、當代斷為兩橛。先生力主當盡量減少政治人物文章，適量加入當代文學家作品，以期活化國文教育。國文科之去政治化，回歸文化本身，當自此次之活化教科書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戒嚴體制鬆綁，校園自主之聲吹起，臺大教師因有教聯會籌設之議，先生亦列為發起人，以表支持。若修改教科書之舉，籌設教聯會之議，或不足以言國之大事，亦不足以狀先生用心之絲毫。先生用心於公共事務，舉重若輕，皆若此類。先生素不喜形式主義，知人論世，若九方皋之相馬，著眼多在牝牡驪黃之外。然見微知著，亦足以見先生之用心所在。

先生固純粹之教育家，而其教育理念則見於其行事之身教。先生入臺大，得從老成者學。先生每言及臺大其時之教師，如臺靜農、戴君仁、鄭騫、屈萬里、王叔

岷、董同龢諸先生，感佩之情，不能自己。臺大中文系早期教師飽經憂患，然亦飽讀詩書；浸漬古典甚深，然亦得五四開放精神；其人皆奉獻學術，不汲汲於富貴，多漠然於名勢。先生秉性凜重，高自風標，雖行事坦易，不拘曲節。然於身家出處或名利場處，則耿介矜然，自飭甚嚴。先生之信守古宜，雖出自天性，亦得自儒門之教，然師門風範，浸入骨髓，潛移默化，自然見之行事。先生不說教，亦不喜說教，然凡從先生學者，多知先生學行教養，日進月化，平易之中，自有凜然不可絲毫改易之節存焉。

先生泛覽博學，出入文哲，所宗則在儒學，於陽明良知學尤嚮往焉。然良知學所重在立心之本體義，先生則並重文化之本體內涵。先生撰文，如論孔門詩教，論朱子道統論，論黃宗羲之文論，領域雖殊，宗旨則一，皆高屋建瓴，格局宏闊。其關懷上承洙泗伊洛之統緒，下紹民國新儒家返本開新之精神，與清末以來分化日甚之學科風尚迥異。其著作散見各學術期刊與會議論文集，主要作品則集於《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一書，先生一生之用心，於茲可見。除《思文論集》外，先生另撰有《荀子假借字譜》與《王陽明與致良知》兩書行於世。

先生德佩彭毅女士，亦為臺大中文系退休教授，相將以道，疑義共析，比翼半世紀，伉儷情深。女兒張菱，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公子張時，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兩人皆負笈美國深造，完成學業。現皆在海外安家立業，克傳家聲。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我對張亨教授的回憶

王安國* 著 黃冠雲** 譯

我很榮幸獲得邀請來分享關於張亨教授的一些回憶。我必須坦承我和張教授相識的時間並不長，而且是在我學術生涯剛開始起步的階段。然而張教授給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影響了我的學術研究，以及後來我如何和同事、學生共事的方式。

我初次認識張教授是在一九七〇年的秋天，那時我是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生，在臺灣留學一年學習漢語。當時我剛在史丹佛大學完成了包括碩士論文的三年學業。在那三年的時間裏，我亦步亦趨追隨的是晚近去世的倪德衛 (David Nivison) 教授，閱讀的是古代的諸子百家，以及像王念孫那樣著名的清代訓詁學者的學術著作。我對《荀子》產生興趣，是因為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老師 John Knoblock 剛開始研究那本著作。而他的研究在多年後發表為三冊《荀子》的英譯。

在協助 Knoblock 時，我接觸了張教授關於《荀子》假借字的研究，亦即《荀子假借字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3 年）。我立刻被張教授的博學與他對上古音的熟諳所撼動。張教授的著作展現了這門科學知識的謹慎應用，及其如何可以開啟《荀子》最著名的幾段不得其門而入的文字。在尚未來到臺灣以前，我就仔細參考了張教授的著作。當我在臺灣師範大學的學習開始進入狀況後，就特地去拜訪他。在那個還沒有電子信件與可靠電話連絡的時代，這麼做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一個教授辦公室的門外佇候，希望得到他幾分鐘的時間。我的策略成功了，但是當我說明來由以後，張教授給了我不僅幾分鐘的時間。當然，我需要向他展示我對《荀子》具有真實的興趣與匪淺的認識。我可能沒有太多的說服力，但張教授還是寬厚地邀請我再度造訪。

* 王安國 (Jeffrey Riegel)，澳洲雪梨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黃冠雲，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那次在張教授臺大辦公室的會面，是我們後來每個月都固定一次或兩次會面的第一次。在為時大約一小時的面談中，張教授大方地允許我提出關於《荀子》一些不解段落的問題。不用多說，我的問題總是相當的多，但是張教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每一個問題，且帶領我穿越文本及注釋的各種複雜的情形。我相信他察覺到我的現代漢語相當有限，所以在解說時，他總是體貼地使用著他認為我會明白的語言。

多年以後，當張教授訪問史丹佛大學，而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尚為一個資淺教員時，他參訪了柏克萊，且與我共進午餐。那時他的頭髮已經斑白（雖然他還相對年輕），而我則因為他還記得我，並且前來看我，感到十分開心。我們一起回憶了多年前初次見面的情景。我感謝他當時對一個年輕外國學生所展現的善意。當我跟張教授學習時，我做了許多筆記，多年來一直珍藏，因為它們記錄的是我開始認真研究一本古代哲學著作的歷程。遺憾的是，我在一次搬家時遺失了這些筆記，所以現在張教授以及那些在他辦公室討論《荀子》的美好時光都只留存在我的回憶中。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以生命直證儒道奧義 ——悼念張亨教授

吳宏一*

提起筆來，一陣黯然。

民國五十年七月，我考上臺大中文系，九月註冊入學。當時的臺大中文系，典型尚在，很多老師都是德高望重的碩學鴻儒。這樣說，一點都不誇張。記得在大學本科四年中，開過課、教過我們的老師，除了系主任臺靜農先生之外，還有毛子水、董作賓、戴君仁、鄭騫、董同龢、屈萬里、王叔岷、李孝定、洪炎秋、許世瑛、張敬、廖蔚卿、葉嘉瑩、張亨等教授，他們或年高德劭，望重一時；或學有專精，聲譽日隆。其中比較年輕的，是廖蔚卿、葉嘉瑩、張亨三位先生，當時都是副教授，大概年在三、四十之間。當時跟他們年輩相仿的葉慶炳、羅聯添等人，都尚未在系內開課，只在外系教大一國文。葉老師教過我們兩門必修課，自然和同學比較親近；廖先生教《文心雕龍》，張先生教《荀子》，我自己沒有選修，不知他們上課的情形，所以比較陌生。只聽選過課的同學說，聽懂了廖先生的川腔國語，覺得她講得實在有深度；又據同學邵紅、吳淑霞等人說，教《荀子》的張先生，教學認真，又年輕英俊，聽他講課，真有如沐春風的感覺。也因此在大學部畢業前，我雖然和他們不認識，但對他們都心存尊敬。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初，我服完預官役，回到臺大讀研究所。剛入住第九宿舍，王憲陽就來找我，說他即將入伍，要我陪他去向他敬愛的廖蔚卿老師辭行。想不到見了面之後，廖先生竟說她常在《中副》上讀到我文章，稱許有民初文人小品的遺風。過了幾天，我到系辦公室去看留系擔任助教的同學邵紅，恰巧遇見了張亨先

本文轉載自《文訊》第369期（2016年7月）。

* 吳宏一，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生，他竟然也說類似的稱讚的話，並且說他剛讀過我一篇〈王靜安的境界說〉論文稿，建議我把其中的一句「溢美之辭」，改為「譽美之辭」。那是我對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評語。那篇稿子則是在發表前先呈請臺老師指正的。「溢美」和「譽美」雖僅一字之差，但關係到《人間詞話》的評價是否客觀的問題。「譽美」只是表示讚美，「溢美」則是表示稱讚得太過分了，反而有批判的意思。我聽了，想一想，覺得很有道理，立刻表示我會改正。

又過了幾天，我去溫州街拜訪臺老師，同時奉上我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微波集》。他非常高興，閒談間，竟然問我家境如何，要不要當助教。當時我嚇一大跳，因為大學同學蘇文寬出國在即，正推薦我去她任教的私立醒吾中學任教，不但不影響研究所的修課，而且待遇相當優渥。所以我一時頗為猶豫，說如果有其他同學需要，可以先考慮別人。

從臺老師家出來，我隨即按地址找到張先生的宿舍。就在臺老師家附近，和平東路二段一條長巷中的日式大雜院裏。屋內陳設頗為簡樸，可是師母待客卻非常親切。原來她也是我們系內的講師，名叫彭毅。那天晚上，他們盛情留我一起在家吃飯。記憶中，飯特別香，話也特別多。我曾向他們請教我的碩士論文，該訂什麼題目，該請哪位老師指導。記得張先生告訴我，臺靜農老師、戴君仁老師、鄭騫老師，對我都很合適。

從此，在系裏，在校園裏，我們偶爾會遇見聊幾句，逢年過節也偶爾會在他們家裏餐敘。雖然他和彭先生一直沒有教過我課，可是他們卻是我一直敬愛的老師。

* * *

民國六十二年夏天，我博士班畢業，留在臺大擔任副教授。前一年國立編譯館國中國文教科書改編，由張亨、戴璉璋、應裕康三位先生負責實際編輯工作。他們和主任委員屈萬里老師、人文組主任齊邦媛先生商議，要藉此改編機會革新教材內容，盡量去除教條化，避免政治化，配合學生學習心理，重新選材注釋編輯。張先生因為一向肯定我對詩詞的賞析能力，所以特地找我參與撰寫其中幾課課文的注釋和析論。例如李白的〈靜夜思〉，一定要強調那是客居他鄉的遊子，秋天午夜夢回時驚見床頭月光的情景，才能欣賞「床頭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好處；例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並不是說夕陽下山，而是藉以形容山勢的高大，說熾熱的陽光被高大的山嶺遮住了一大半。其實這都是清代徐增《唐詩解》分

析過的，只是一般人習於成說，囿於所見而已。

據說大家對我所撰寫的幾課課文分析，都還滿意，所以在我博士班畢業時，恰好應裕康先生應聘到新加坡講學，就由張先生提議，最後經屈老師和館方同意，由我遞補應先生的位置。從此我在國立編譯館前後二十年左右，參與過國中國文、國小國語等等教科書的編審工作。就國中國文而言，其間為選教材範文，曾發生一些「新聞事件」，例如黃春明的〈魚〉、楊逵的〈春光關不住〉（由我建議改題〈壓不扁的玫瑰花〉），都曾引起外界非議，我所寫的語文常識〈韻文源流〉，最後提到余光中、洛夫、白萩等新詩人，也曾招來無謂批評。特別是張先生中途退出、齊先生隨館長離職、屈老師去世以後，我跟隨戴璉璋一起並肩作戰好幾年，真的頗有些事情「可待成追憶」，一時難以說得明白。我想後來代理和接任人文組主任的韓道誠、黃發策最為清楚，當時在館服務的趙天儀兄，應該也略知一二。

我所以為參與編輯國中國文教科書的事，多說了幾句，主要是因為從民國五十年我入讀臺大之後，一直在臺大讀書、教書，後來出國遊學、講學，也一直在大學校園和學術機構裏，對於臺灣中小學的教育狀況，特別是學生學習中文所遭遇的問題，可說日漸疏遠而缺乏了解，很容易流於主觀自大，瞧不起中小學教育。就因為參與了國中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小組，我才知道那是另外一門學問，雖淺而實難。我才知道用淺近的文字來表達高深的思想情感，是多麼困難。我也才知道，教育除了學校教育之外，還有家庭和社會教育，那是一門大學問，人人不可囿於所見，妄自尊大。而這一切的體認，是從張先生引薦我參與國中國文教科書開始的。在國立編譯館編書期間，我從張亨和戴璉璋兩位先生身上，學到了不少做事認真、待人寬厚的道理。

* * *

說到做事認真，待人寬厚，張先生的故事不少。就因為做事認真，他才曾為幾篇範文選材的問題，憤而退出教科書的編輯小組；也因為他在同輩之中，最受師長重視，做事又堅持原則，公而忘私，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我在臺大任教時，就有一位校外擔任系主任的朋友，向我訴苦，他們系辦的學報，有一篇有關思想史的論文，請張先生審查；他的審查意見竟寫：以貴刊水準，此文尚堪採用。我自己受曾濟群兄之邀，為劉真先生主編的「中山文庫」人文類編書時，約請當時中山大學徐漢昌主任寫一本《先秦諸子》的專書，送請張先生審查，他也實話實說，直陳缺失，客觀而毫無假借。以我自己為例，前年初我擬寫一篇推薦余英時學術成就的短

論，去他後來住的溫州街公寓請教一些問題，他知道我的英文不好，竟然先問余先生的英文著作我看了沒有。待我說明已讀過所有中文譯本以後，他才不追問下去。他的個性就是如此。基於對學術的忠誠，我也一向贊成他這麼做。

或許會有人批評他過於嚴格，但我知道他是對事不對人。對事他認真嚴格，但絕對不會「過」於嚴格；對人則溫馨親切，絕對不讓人吃虧。我知道他疼愛學生，只有付出，不求回饋。例如他照顧邵紅、陳燕、張淑香等人，就如同對待自己的女兒。他常常為修訂學生的論文，付出不少心力。我知道他指導論文的研究生不多，都要先經過嚴格的挑選，確定對學術的真誠，可是接受之後，他必然會全心全力予以指導，視同家人。他指導畢業的博士實在不多，但據我所知，像楊儒賓、吳冠宏、林啟屏、黃敏浩等人，個個優秀，表現都非常傑出，沒有辜負他的栽培。

每當有人在我面前提起張亨先生如何如何的時候，通常以下的兩三個鏡頭，會偶爾閃過我的腦海。第一個，民國六十年初，他和他兒子張時正提著棒球手套和球棒，經過僑光堂（現在的鹿鳴雅舍）要進校園去打棒球，那時候他的神情就像個棒球國手。第二個，民國七十五年，我和他都到美國訪問一年，我們在美國西岸、東岸都見過面。該年三月，他先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看我，再約我到他客座的史丹佛大學一遊。不但到車站接我，參觀他的研究室，安排和莊因夫婦等人吃飯，而且最有趣的是，他還會拿起剪刀示範自己如何修剪頭髮。第三個，民國八十九年底，那時候我已正式自臺大退休，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趁寒假返臺去探望張先生，並向彭毅先生的惠告退休手續如何辦理，表達謝意。他們都已退休，言談間，一向心直口快、古道熱腸的彭先生，雖然心臟不好，但似乎脾氣比以前更為剛烈，對是非善惡的批判也更為痛切。反而張先生比較沉默，往往在彭先生說話告一段落時，才略作補充。其餘時間，只在一旁斟茶。我永遠記得他不時觀看彭先生的那種神情，那就是所謂鸚鵡情深吧。那天晚上，他們依然盛情，慢步請我到附近素菜館用餐，談起臺老師，談起廖蔚卿先生，談起系裏一些過往的人與事，在茶煙繚繞間，我發覺我的話少了，視線逐漸模糊了。

如今，聽到張先生的噩耗，心中一片惘然！怎麼說才好呢？

附記：張亨先生，民國二十(1931)年生，山東泰安人。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曾赴美、港講學，專長儒道思想及中國學術思想史。民國一〇五(2016)年五月十九日，病逝臺大醫院；五月二十八日公祭、火化；翌日墓葬於陽明山。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令人難以忘懷的平淡無奇： 紀念張亨老師

李弘祺*

楊儒賓教授寫信來告訴我張亨老師過去了，我有點吃驚，因為張老師算不上很大歲數，平常退休在家，生活平靜，照說可以與師母一同頤養天年，不應如此早逝。但是正如世人所說，人生過了六十五歲便算是壽終了，所以我只能在這裏感念萬物生息的奧妙，祝福老師一路好走。

嚴格說來，我完全沒有資格在這裏稱張先生為老師，因為我一共只上過他一年的大一中文，對於他的學術完全沒有瞭解、更說不上實質的受益。但是張老師和師母對我和內人（陳享）一向照顧有加，每一次我們回臺灣，總會去看他們，而他們也總是要帶我們去吃飯。他們對學生的親近和照顧，這都是我們永遠難忘的。

張老師最重要的、值得我們常常想念的就是他對平淡無奇人生的追求。我這句話說得或許自相矛盾，但是要讓自己出名，非常容易；要能過一個完全「平淡無奇」的生命或穿透這樣的世界，這是要「追求」的，要做出非常大的犧牲和努力的。孔子一生所尋覓的，就是能進入一個真正的道德世界：在他看來，只有能「不逾矩」，才能得到「全不費功夫」的自由境界。不逾矩，這是何等的困難！張老師一生絕對是在尋覓這樣的自由。

張老師和師母一生不求功名，一介不取，時間都花在書本裏，自得其樂，因此除了學術上面能達到智慧的真諦，更能覓得物我渾然一體的「會心」。他們的樂趣更在啓迪學生的靈性，幫助他們能自己也一樣地把握生命中最有樂趣的「無別」，而得到那種平淡無奇的正觀。

* 李弘祺，國立交通大學退休講座教授、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退休教授。

因為如此，張老師的學問不是鉅釘，而是近思；他對待我們這些學生的態度處處反映出這樣的自然。用一句非常平凡的話來說，這就是能近取譬，設身處地地瞭解學生。用現在流行的用語就是具有「同理心」(empathy; Einfühlung)，或者說十分地 personal。這是他令我們非常感念、覺得特別體貼的地方。每一次我和內人去看老師和師母，總是感到那種格外的溫馨。我們相對，無話不說，而他們從來不吝嗇發出「會心」地微笑，就是講錯了、記錯了、認錯了，也都覺得樂在其中。這樣的感情的確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達到的。我們將永遠記得這樣的感受和時光。

歡笑已經過去，沒有了老師，沉寂就要來臨，本來並不絢爛的相遇和人生，又歸於平靜。在我們的心中，您果然是一種情境、一種模範、一種令人難以忘懷的平淡無奇。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門前學種先生柳——敬悼張亨教授

孟繁舉*

民國一〇五年五月二十日上午，我接到彭毅教授的電話，他說：「張亨昨天走了。」我聽了大吃一驚，記得前兩個月，才跟他通過電話，知道他最近常進出醫院，想不到他竟然離開了。彭毅還說：「後事由臺大中文系主辦，不發訃聞。」

稍後，我又接到老同學何德民的電話，告訴我這件事，說著說著，他哭起來了。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有關張亨教授的品德文章，崇論宏議，由臺大中文系諸君子和他的及門弟子去發抒，這裏只寫我們老同學之間的一些瑣事。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在文中直書張亨其名，雖然有些不敬，但若加教授二字，更覺得疏遠，對於他的夫人彭毅教授，我的態度也是一樣。

張亨是山東省泰安縣後省莊人。馬家廟小學、省立泰安中學初中畢業。初中以前名字叫張憲亨，高中改名張亨，他沒有字，但有個號叫「後省」，這個很少有人知道。

和張亨認識是在山東省立濟南第五臨時中學，我和他同時考進五臨中高中部，編入高一甲班。他身材矮小，坐在教室第一排，和劉業昌是同桌，我坐在第三排，和何德民是同桌。

張亨初露鋒芒是在第一次月考，善後救濟總署發給學校一批救濟物資，是一批棉大衣，因為數量少，學校決定發給這次月考前三名的學生，張亨就得到這份殊榮。

五臨中的學生絕大部分住校，張亨通勤（張亨的父親是省政府祕書），課餘談話的機會較少，但是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 孟繁舉，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退休教師。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學校剛開學，共軍對濟南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由於守軍吳化文的叛變，戰事急轉直下，沒幾天，濟南就淪陷了。

濟南大部分的學生都心向政府，不管是南下、東進，目標都是南京。我跟兩個哥哥到青島，在青島遇到了老同學張亨，他和一臨中的同學李偉，住在朋友家的車庫。據李偉說：教育部在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設立了濟南第一聯合中學，首任校長是他一臨中的老校長劉澤民，他們準備去投靠他。我和兩個哥哥要去鎮江依親，臨行，我和張亨約定：他們到達上海後，寫信通知我。不久，我接到張亨的來信，我趕往上海中國公學跟他們會合，沒幾天，上海市政府用專車把我們送到了長安鎮。

長安鎮是個小鎮，卻有兩個大絲廠。我們高中部設在連元絲廠；師範部、女生部設在長安絲廠。學生的伙食，最初是吃大鍋飯，後來改由學生自組小伙食團向民宅借炊。我和張亨、李偉在河邊找到一處民家作飯，吃得飽，米還有得剩餘，常拿去民家換些蔬果加菜。

學校沒有開課，學生四處遊走，我們常去杭州西湖遊玩，也曾去江邊觀賞錢塘江大潮。那時，我們生活十分困苦，但苦在口體，樂在心頭。

好景不常，民國三十八年初，共軍準備渡江，江陰要塞司令投降，局勢驟變。一時風聲鶴唳，學校奉命南遷，我和張亨、李偉乘車先到杭州，再搭一部衛生列車南下。衛生列車車廂都貼了封條，不准進入，我和張亨、李偉占據了一個車門，左右站一人，中間坐一人，其他同學就沒這麼幸運，他們只好爬到車頂，遇雨或過山洞，往往弄得灰頭土臉，苦不堪言。

車到南昌，不走了，我們只好改搭其他火車到衡陽，在扶輪中學住了一陣子，又改搭專車直達廣州。在廣州，我們住進一所小學，中飯後常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睡午覺，晚飯後去珠海大橋遊玩，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

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和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跟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達成協議，全部學生去澎湖半訓半讀。這時，李偉有了警覺，決定不去澎湖，改去雲南投靠姐姐。他在大陸考上醫學院，在哈爾濱當醫師，這是後話。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我們搭濟和號登陸艇到達澎湖漁翁島小池角，住進一所國民小學，七月十三日李振清毀約，學生全部編入部隊，反抗者則償以刺刀，釀成流血事件，學生遭受暴力控制，噤不敢言。

九月下旬，澎防部為了平息眾議，讓一千多名學生接受學科測驗，錄取約十人到臺灣參加大專入學考試，張亨以優異成績脫穎而出，終於脫離苦海。

張亨考取臺北師範學院（今師大）國文系，我也於民國四十年考入聯勤軍需訓練班（後改制為國防管理學院），我到了臺北，去師院宿舍找張亨，他告訴我說：「業昌聽說你離開了澎湖，高興地跳腳。」老同學的關懷，真是讓人感動。

民國四十一年底，我和業昌自軍需訓練班畢業，臺北的老同學蘇岱秀、劉孝雙邀集張亨、馬景晨、劉傳恭在臺北工專設宴慶賀，餐後，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合照（這張照片在民國一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張亨告別式中首先播出）。民國四十二年二月，我分發到花蓮聯勤第四收支組服務。同年張亨自師院畢業，他和十幾位同學環島旅行，到花蓮時，我設宴款待，賓主盡歡。不巧，接連幾天大雨，蘇花公路中斷，張亨他們困在花蓮，進退不得，我協助購買機票，讓他們順利返回臺北，這件事宜蘭高中趙元正老師曾向我提及，楊承祖教授可能還記得。

張亨畢業後，分發到臺北縣新莊初中任教，後來考上臺大中文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教，認識了同在臺大任教的彭毅，兩人情投意合，不久結成連理，是當時最受人羨慕的一對。他們起初住萬盛里，後來搬進潮州街臺大宿舍，最後定居在溫州街臺大配售的房子。那時我也自軍中退役，一方面在臺北市螢橋國小教書，一方面讀中興大學。

在此要特別提到一位長輩——游令仁，他是張亨的表叔，我們這一夥也隨著叫表叔了。游表叔頗有長者風範，在我們窮困時多所照顧。民國九十七年表叔去世，張亨特撰〈追思令仁表叔〉誌哀，表叔的兒子游銘九也跟我們熟稔，成為我們這個小團體的一分子了。

張亨任教臺大期間，多次出國，最早是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也曾到史丹佛大學進修研究，又到威斯康辛大學、密西根大學講學，一度到新加坡參加國際會議，後來轉任香港某大學客座教授。每次出國，我們老同學都會設宴餞行。大家歡聚敘舊，彭毅都會參加。彭毅是一位具有儒門風範的大家閨秀，容貌美麗，端莊大方，她不會跟我們這一群粗獷不羈的人格格不入。相反地，她很欣賞我們這些老同學性情率真、心地純良，即使我們言語不遜，她也不以為忤，跟我們相處融洽，態度自然。

張亨不喜歡行政工作，只是埋頭研究、講學。民國六十一年應臺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教授之邀，擔任主編標準本國中國文之職，新課本取材新穎進步，頗受國中師生歡迎，但是卻惹惱了一些守舊分子，橫加詆斥。如新課本選了楊喚的〈夏夜〉被批評為「教孩子們看到月亮想到錢」、黃春明的〈魚〉被批評為「十分無聊」、

《西遊記》的〈美猴王〉被說成是在「影射蔣總統退守臺灣」。張亨一氣之下，堅決辭職，由吳宏一教授繼任。（參看柯慶明〈談笑有鴻儒〉文、齊邦媛著《巨流河》）

民國七十二年暑假，我到師大研究所進修，住進師大宿舍，張亨去看我，未遇，留下紙條：「繁舉：返後希即打電話給我，一起去吃飯。弟亨字，廿一日五時正。」我和張亨來往的信件很多，都沒保留下來，這張紙條意外被我保留至今，我認為這張紙條充分表現了我們之間的純真友誼，而且他的字實在清秀美好，教人愛不釋手。

民國七十三年，張世沅的長子在新竹結婚，我和張亨、業昌、德民前往參加，世沅非常激動，一直找機會跟我們攀談，感慨殊多。想想看，四十多年前大陸的高中同班同學，能有五個人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

不幸的事慢慢降臨。老同學最先去世的是姜雲漢，他晚年得了血癌，到臺大醫院治療，一直瞞著老同學，直到病危前夕才告訴夫人，歿後去臺大中文系找張亨協辦後事，張亨緊急通知老同學到殯儀館送他最後一程。馬景晨自己是醫師，卻忽略自己的健康，一天，工作中，他累了，趴在桌子上休息，沒有再醒來，以心肌梗塞去世。接著劉玉珂、劉孝雙、張世沅相繼過世。劉業昌寓美返臺就醫，張亨邀集老同學在臺北市天廚餐敘，業昌手術順利，但病情時好時壞，終告不治，病逝榮總。這正如曹子桓所言：「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痛心。」

張亨於民國八十六年退休，我曾撰七言絕句一首相贈：

集句賦後省教授臺大榮休

青山綠水去無聲（朱熹）

秋風忽憶江東行（李白）

門前學種先生柳（王維）

萬里歸心對月明（盧綸）

這首詩感念我們流亡的過程，也讚許張亨高尚的品格。陶淵明的志節，在他自傳〈五柳先生傳〉中傳達得很清楚，「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他的品德高潔和認真自得的曠達懷抱，張亨樣樣都有，只是他性不嗜酒，這一點和五柳先生很不一樣。

張亨不以詩名（錢穆、唐君毅都是），他的詩作在學術殿堂、坊間很少見到，他曾贈我以詩，是一首五律：

贈繁舉

我愛孟夫子，文采天下聞。誨人不知倦，瘦筆覺有神。

桃李三千士，儼然師道尊。且樂蘭陽雨，夢逐岱嶽雲。

詩明白平易，對我是過獎了，他還覺得我的瘦金書寫得很好，這也是過譽，就當作是鼓勵吧！

張亨的文章可就不一樣了，他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荀子法後王解〉登在《孔孟月刊》，析理明白，言之有物。後來他和彭毅註譯多篇古文，發表在《國語日報·古今文選》上，那只是做研究的初步，不算是學術著作。他在某報發表過一篇論文〈臺灣儒家思想發展問題管見〉，是一篇高水準的論著。在臺大任教期間，他在《中外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等刊物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可說是字字珠璣，擲地有聲。後來他把部分論文集結成冊，命名為《思文之際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他以現代的觀點，開放的態度，來詮釋古典文獻，探索其中蘊涵的意義。他說：「這只是學思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見該書簡介）實在是過謙。這本書受到學術界廣泛地推崇，林毓生教授譽為：「張亨先生的文章，尤其是那篇〈《論語》論詩〉已達到世界第一流的水準，是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最難得、最好的文章。」

張亨任教臺大中文系四十年，早期受教於臺靜農、鄭騫、戴君仁、王叔岷、屈萬里諸大師，薰陶漸染，涵養功深。及至大師相繼謝世，張亨成為臺大中文系的資深教授，他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桃李何止三千，但他只熱心研究教學，不求聞達，從其學者領會其學養，感佩其耿介。揚雄《法言》云：「師者，人之模範也。」像張亨可說是民初教育家范源濂氏所說的「有一個作老師的樣子」。

張亨，民國二十年生，今年八十五歲。在我們這群老同學中是年齡最小的，是以他驟然離我們而去，實在教我們難以割捨。他與愛妻彭毅鸞蝶情深，而今愛妻年逾古稀，女兒張菱、兒子張時，在國外剛成家立業，如今遽別愛妻，拋棄子女，他的內心恐怕也是萬分悲痛的。但「人生是個有來有去的歷程。來是偶然的時，去是不可避免的順」（王邦雄教授語），人們只有安於來去，順應自然了。

故人已去，歡聚難再。我現在只能借用東坡先生哀悼王荊公的話，來表達內心的感受：「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贈繁舉
 我愛孟夫子
 文章天下聞
 誨人不知倦
 瘦筆更有神
 桃李三千士
 儀態師道尊
 且樂如陶陽
 夢還欲敬而

張亨贈繁舉詩

繁舉：返及希即打電話
 給我，一起去吃飯
 弟
 張亨
 五月廿四日
 乙

張亨留給繁舉的便條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亦師亦友」悼亨兄

林順夫*

今年五月的下半月，我有兩星期人在臺灣。我以往返臺，除少數幾次例外，大多是以公務（如參加研討會、訪學、回母校東海大學短期授課等）為主要目的，順便回臺中老家探望一些近親。每次返臺，我都會毫無例外地抽空到臺北去拜訪老友張亨兄。上次我是在二〇一二年五月的第一星期返臺的，就是少數例外中的一次。五月二日下午我向亨兄道別時，他說：「順夫兄每次回來都來去匆匆，我們聚會的時間都很短，沒能暢談，實在不過癮。您這次回臺中探視家人後，再抽空到臺北來吧！我們也可以有較長的時間談談。」我回答說：「亨兄，實在抱歉。我大姐去年中風，除半身不能動彈外，也失去了言語能力。經過一段復健的工作後，她身體已經大致康復，不過說話能力卻只恢復了一些。我這次回來主要是去看看她的。我還有很多近親在臺中。我長年旅居國外，不常返臺，這次回來，應該多花點時間跟他們團聚。」亨兄說：「本來就應該如此。」我說：「下次我再回臺灣一定再來拜訪您。」沒想到，這些道別語，竟成亨兄跟我能夠面對面交談的最後幾句話！

去年年底我曾經與亨兄通過電郵。當時，我剛把亨兄贈送的新書《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裏以前沒見到的幾篇細讀一過，因此就發電郵略表謝忱與敬佩之意，並順便跟亨兄和毅嫂賀新年。我於信上說：「前承寄賜大著《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謝忱未申，至感愧疚，乞諒！大著把原先《思文之際論集》增益，收入六篇新作，學人能於一冊中盡窺吾兄一生治學碩果之全貌，真令人感激振奮。新錄六篇中，有一半弟早已拜讀過，因吾兄曾把抽印本寄贈過來。『說道家』、『說儒家』和論『知之濠上』等三篇，則是接到新集後，才慢慢看的。佩服！佩服！今後弟再寫有關《莊子》論文時，肯定會從大著多所援引的。」亨兄在

* 林順夫，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文系中國文學榮譽教授。

回函裏說：「很高興收到您的電郵。繆贊則不敢當。弟因心臟病住院一個多月，最近才出院，大致痊可，請勿念。吾兄退休生活一定非常愜意，令人羨慕。」接到電郵後，我雖然大吃一驚，卻也覺得，亨兄既然說「大致痊可，請勿念」，他健康狀況應該還可以吧！上個月返臺，計劃除與姐弟和一些近親團聚外，我就只要靜悄悄地去拜訪張亨夫婦。沒想到，五月二十日打電話去張家安排造訪時間，彭毅教授說亨兄已於十九日「成仙」去了！驚愕之餘，我跟毅嫂說了些不知所云的話，萬萬沒想到亨兄會這麼快就離開我們！已重病纏身的亨兄，在給我的最後簡短電郵之一裏，仍展現他一貫「謙退」(self-effacing)、「處處替人著想」的個性與涵養，跟他已「交遊數十年」的我，竟在反應時顯得「頗為無感」(rather insensitive)，現在回憶起來，真覺汗顏無地！

我初次認識張亨兄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那年夏天，我剛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完兩年中國研究博士班，決定暑假到哈佛大學附近去住，以便利用這家老學府的上好圖書設備（尤其是哈佛燕京學社的中文藏書）。湊巧當時在哈佛讀碩士學位的東海大學老朋友李三寶，暑期要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教中文，就把他在哈佛校園附近一棟家居翻修成的公寓所租的房間轉租給我。我搬去住後，才知道這家座落於麻省劍橋城劍橋路一六七三號(1673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公寓（其實是一棟非常老舊的大房子），是好多位前輩華人學者在哈佛留學時寓居的處所。我聽人說過，但沒有親自去查證，張光直、余英時，以及業師高友工諸先生，都曾經在這裏住過。一九六九年前後，住在這棟老房子、從臺灣來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學生，除了李三寶外，還有詹春柏（近期臺灣政壇名人）和劉翠溶（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等在哈佛深造的留學生。（附注：2011年秋天，我去哈佛參加在東海大學時教過我「二十世紀英美文學」的 Lawrence Buell（畢樂純）教授的榮休慶祝會，就住在劍橋路一六七三號——不過，該住處已經不再是專供華人留學生住的老屋，而是經過整修翻新成蠻漂亮的、供應床和早餐 [bed and breakfast] 的「友善客棧」[A Friendly Inn] 了。）張亨兄原來也是住在這棟老房子的。我搬進去前，他已經搬出去，另外找到一間較大的住處了。他這樣做是為了接妻子彭毅教授去同住；可是很遺憾，後來彭教授又因故沒有去成美國。雖然亨兄已經搬走了，我還是很幸運地有緣跟他結識；也許是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或者就在亨兄再來原住的老屋看朋友時。初次見面後，我們又有多次交談的機會。我覺得他很平易近人，頗具親和力。在知道我在普林斯頓的中國文學指導教授是高友工先生後，他特別跟我談到高

老師在臺灣大學做學生的些許趣事。他說，高先生本來是在臺大讀法律系的，有一天他跑到董同龢先生的課堂去，聽過那堂課後，就決定轉讀中文系，結果後來成為該系最傑出的畢業生之一。（2016年11月8日補注：上月29日早晨，高友工師在其紐約市寓所於睡眠中安詳地過世，享年87歲。）我記得我曾問過亨兄，聰明絕頂的高先生，怎麼會在旁聽了音韻學專家董先生一堂課後，就立即改變原先讀法律的志願呢？他回答，也許高先生是被董先生做學問的方法所吸引的緣故吧！他說他自己也是董同龢的學生，他在臺大中文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時，就上過董先生的課。董先生最令亨兄佩服的，並不是他有什麼淵博的學問，而是他新穎的、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與方法。近半世紀前我結識張亨兄後，他跟我多次交談所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對董同龢先生做學問的態度與方法之評論。亨兄返國前把他用過但不願帶回去的郭慶藩《校正莊子集釋》兩冊送給我。後來《莊子》變成我教學和研究最愛的文本之一，而亨兄送給我的這部註莊名著就用了幾十年。

亨兄於結束哈佛燕京學社兩年的訪學返國後，我慢慢地開始讀到他的學術論文，如〈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陸機論文學的創作過程〉、〈《論語》論詩〉等。這些論文篇篇精彩，其視野之開闊，見解之新鮮，討論議題之全面性，以及材料運用與文本解讀之精審，都令人佩服。總的來說，那一絲不苟的審慎風格，不就是前面亨兄所記述董同龢先生治學態度的體現嗎？在援用一些重要的現代著作和新觀念來講論中國古籍時，亨兄也一貫周密謹慎，絕不牽強附會或流於空論化。這對出身英文系、常想借用自己所知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來作詮釋工具的我，真是莫大的啟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某一年，曾永義兄來我任教的密西根大學做訪問學者。因為他常來找我專研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的同事 James I. Crump（柯迂儒）先生，所以我也有機會常跟他見面、閒聊。有一次，我們談到他在臺大的同事張亨的學術著作，他說：「張亨出版的東西雖然不多，可是篇篇都是出版後就『一鳴驚人』、令人嘆服的！」我跟永義兄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評論。事實上，我也逐漸地把亨兄好多篇析論中國思想與文學的論文尊奉為典範之作的。在我退休（即2012年）前的二十年間，我在密大給博士生開過好幾次《莊子》討論班的課，亨兄的〈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和〈莊子哲學與神話思想——道家思想溯源〉總是選錄入班上學生必讀的最重要解讀材料中。

我是一九七三年秋天開始在密西根大學亞洲語文系講授中國文學的。根據美國大學普遍實行的終身教職（即 tenure）制度的規定，我必須在當助教授後第六年

(即 1978-1979 學年) 接受學校的「終身教職審核」(tenure review)。審核如果通過，我便可晉升為副教授並且有權利在密大終身執教；如果沒有通過，我就只再有一年的執教寬限期，然後就得離開密大另尋出路。審核的過程相當繁複，除了我執教的學系要對我五年來的教學與學術研究及著述作全面的評價外，還須從校外請好多位我行內的知名學者專家來參與評審研究及著述的工作。按照規定，受審者有權利建議一些校外的專家來參與評審，但挑選正式人選，則由所屬學系決定。經過仔細考慮後，我把張亨教授錄入校外評審人的推薦名單內。我想若有像亨兄這樣在國際名校任教，既有非凡的成就又做事認真負責的學者來參與，將是我個人的榮幸，也將對我的評鑑有極大的助益。這次評審，我順利通過，因此也獲得了美國人認為是一件「神聖的東西」(that sacred thing) —— tenure，得在美國名校密西根大學終身任教職。事後，亨兄私自告訴我，他被邀請參與評審，而且邀請他的人還特別說，他可以用中文寫出報告，如果他認為這樣比較方便的話。雖然，亨兄只是參與評審我的諸多校外學者之一，他的（肯定是「一絲不苟」的）報告，一定是在我系送呈學院的整個評鑑資料裏占有很重的分量的。

二〇〇〇年的秋天，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當時的主任 Martin J. Powers 教授發信給校內做中國研究的同仁，說中心有一筆捐款可以用來從亞洲邀請一位學者來密大訪學一學期，邀請來的學者只須教一門沒有學分的小討論班的課就行，其他時間可以自己做研究工作。接到此信後，我唯一想要推薦的就是張亨教授。可是，中國思想並非我的專長，如果由我來推薦張教授很難成事。於是，我就把推薦張教授的構想跟當時在密大講授中國哲學的同事 Philip J. Ivanhoe (艾文賀) 教授提起。我把亨兄贈送給我的論文集《思文之際論集》借給艾教授，並且請他特別先挑其中討論《莊子》、《論語》、《荀子》的幾篇來看看他認為是否合適推薦張先生來我校訪學。隔幾天後，艾文賀寫電郵給我，說他已經看了幾篇張先生的論文，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學者，我們應該推薦他來中國研究中心作訪問學者。同時，他主動表示願意撰寫送呈中心的推薦書，但要我也簽推薦書，作為共同的推薦人。經過中國研究中心的執行委員會審核後，我們的推薦很快就被接受，而亨兄也於二〇〇一年冬季順利來密大訪學一學期。對我來說，能請亨兄來密大訪學一學期，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因為我們亞洲語文系和中國研究中心一些做中國文化的教師及研究生，難得有機會能親炙像亨兄這麼有學問與修養的學者。另外，亨兄《王陽明與致良知》一書是他在密大訪學這學期完成的。也許我們中心邀請他來訪學，讓他有相對

的安靜環境去完成該書的撰寫，對此我也感到「與有榮焉」。

在書信裏和口頭上，亨兄總是以「順夫兄」來稱呼我。然而，亨兄跟我的關係要用「亦師亦友」來描述才恰當，才符合事實。我從來沒有選修過亨兄的任何課而正式當過他的學生，那麼「亦師」這部分應該怎麼說明呢？我在普林斯頓讀書時，中國文學方面的指導教授高友工先生，是一個很奇特的明師（不只是名師而已）。他告訴過我不要只是依循他的路數，而要「轉益多師」以開拓出自己做學問的道路來才行。亨兄是我多年「轉益多師」後，所獲得的少數幾個楷模之一。從結識亨兄因而有緣向他請益，到後來陸續熟讀他的著作，我就一向心儀前面稍已述及的亨兄的審慎、深入、一絲不苟的治學方法與態度。亨兄治學的特色，還是他本人敘述的最為清楚。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思文之際論集》的序言裏有如下文字：

這些論文探討的問題雖然分散，但有三個基調可說：（一）大多是從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出發，思考其蘊涵普遍性的或思想史的意義。（二）儘可能依據原典或文本作直接的詮釋。（三）這些詮釋是在一個現代人的存在情境之下、無可避免的前理解中進行的。

從心儀到直接地去學習與效仿，是一個極自然的過程。我師承亨兄做學問的方法，有什麼證據與結果嗎？清華大學出版社於出版本人論文集《透過夢之窗口》前曾向國科會申請補助，而國科會請了張亨教授來審核並撰寫一份報告。亨兄於二〇一〇年底透過電郵寄給我他的「報告」（他謙稱是「讀書報告」！），說：「此已事過境遷無匿名審查避忌問題。」且從亨兄的審查報告引幾段來例證他對我的影響：

林書這十五篇論文分別討論莊子、詩詞、文論、藝術散論及小說，似乎各不相屬，而以「透過夢之窗口」書名貫串之，不僅別緻生動，而作者對文學藝術之理解與所終極關切之問題皆凝結其中。若挈裘領，使散篇匯為一體。

林書最大的特色是對原典文本的精密深細的解讀與詮釋。其研究的立足點已足以讓讀者信服。進而適當的、靈活的運用西方的文學與語言的理論，使論述堅實而精闢。如以布雷克曼等的「面具說」（頁5）詮解莊子的「寓言」、「重言」等修辭設計。同時，他對此說也加以討論，並非泛泛地引用而已。或者借用音樂的「變奏技巧」來解釋莊子的寫作手法。（頁103）等等。其參照、比較文學藝術理論的態度是開放的，既不主一家，也不任意附會。事實上，他個人獨到的洞見並不必借重任何理論。如他銳敏地發現「禮」是一般認為《儒林外史》沒有布局的「敘事結構」（第十三章）等，都是作者潛

深思考的成果。

林書對所研究的文本的相關資料，都有周詳的探本溯源的考慮。特別像《莊子》以內、外、雜篇編在一起，如何辨識取捨，是大問題。林書於此非常慎重。從他的第二章評葛蘭的英譯，對葛蘭把〈天運〉的第一段挪到〈齊物論〉去之類的評論可知（頁36）。這並不同於一般的考證訓詁工作，作者在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都能顯見其功力的深厚。不過，作者對葛蘭整理莊書的識見與貢獻也曾加贊賞。進而追溯翻譯理論及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問題。至於因詮釋《紅樓夢》之夢因而追溯中西「夢」之理論。以明儒王廷相之說，對夢之本質的理解，實較佛洛伊德「更為精確」。（頁350）其論述之客觀可見一斑。

「報告」所論拙著對於原典文本的解讀與詮釋，以及對於文本相關資料的處理，正是我盡力師法亨兄的典範著作之處。我曾經幾次想直接跟亨兄提及，在思想知識上我從他獲得的良多益處，可是每次話到口頭又吞回去了。此中原因，就是我深怕謙遜如亨兄的儒者，一聽我這樣說，會立即駁斥的。現在亨兄已經走了，我欠他的這個 intellectual debt 也已經成為一個永遠無法直接支付的遺憾了！

2016.6.29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悼念、懷念張亨兄

林毓生^{*}

張亨兄仙逝，我的內心感到十分悲痛。半個世紀前，我們在麻省劍橋初次見面，和其他訪問學者不同，亨兄常去哈佛聽課。後來知道他研究先秦諸子，偶而和他談到其中的議題，發現他根底深厚，見解精湛，我便常向他請教有關的問題。

八〇年代初期，我與祖錦返臺時，一定和亨兄、毅嫂重聚。多半在他們府上盤桓終日（後來一直保持著此時形成的相聚習慣）。當時臺灣的威權體制已經漸次鬆動，社會上瀰漫著變革的動能；雖然，對於什麼是民主複雜的內涵知之不多，但對於民主制度之下一般人將不會受到專制的宰制，則有共識。

我一向關懷臺灣轉向憲政民主（或稱自由的民主）發展的可能，然而遠在海外，只能從寄來的報紙、雜誌上看到有關的報導與評論。所以，返臺以後便儘量向在媒體工作和少數參與實際政治的友人們，詢問情況，交換意見。希望藉此得到一些具體的實感。

亨兄、毅嫂與上述那兩類人不同。他們是參與各項投票的當地居民，對於媒體上的報導與評論以及政治人物們的言行，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聆聽他們來自民間的聲音，對我而言，當然也同樣重要。

每次聚談，亨兄的話不多，毅嫂發言比較熱烈。亨兄言簡意賅，每每一語中的。其所以能夠如此，源自——打個比喻，他在此山之中，卻又處於此山之外——他關懷身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環境與趨向，在心靈上則超脫他所關懷的環境的羈絆，而達旁觀者清的三昧。

在彼此信任、自然抒發的言談之中，我們的友誼油然而有所增益。亨兄清正自守，他在這種環境中所流露出來的性格，自然也反映在他為學與做人的風格之上。

* 林毓生，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儒家，一方面，有其積極入世——舊時稱之謂希冀「致君於堯舜」與「經世致用」——的傳統；另一方面，則有尋求心靈獨立與自主（當然也可稱之為心靈自由）的傳統。亨兄在教學與著作中常喜徵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這是心靈自由的重要條件。

另外，亨兄在說明儒家思想傳統重要觀念時，一方面，堅定地站在其詮釋傳統的主流之中；另一方面，則強調儒家傳統另有「高於從政的價值在」¹。他徵引《禮記·儒行》「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的前例，以其說明在傳統中國的專制政體下，為什麼有的儒者能夠在個人心靈自由與道德實踐上「自成一獨立的精神王國」²。

在我們這個混濁的時代，亨兄在他的「獨立的精神王國」之內，為學與做人，自然有非凡的成就。他的朋友與學生們對他均有發自內心的尊敬。我們慶幸他的鉅著《思文論集》已於一年多前出版精印、精校本。其中有些篇章，如《〈論語〉論詩》，文筆洗練而暢達，見解深邃而清澈，論旨則展現有機的系統性；其學術成就，已達世界最高水平，自可傳世。

亨兄熟讀《莊子》，現已在大化中矣。祝願他在其中遨遊無礙。

2016.8.17

¹ 張亨：《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567。

² 同前註，頁xi。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張亨教授與我的舊事

金學主^{*}

幾天前接到從臺灣送來的訃聞，與我至交的張亨於五月十九日逝世了。我今年四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到臺灣，參加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所主辦的「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當時我聽說張亨教授幾個月前身體不舒服，曾進行心臟手術，雖已克服危機，但還在醫院。二十二日我發表論文後，二十三日早晨齊益壽教授領我探望在臺大醫院住院的張亨。他在護理員的看護下，住在甦醒病房，自己的身體好像不能自主，坐臥都不自由。我們到病房時，張亨似從外邊剛進來，在輪椅上斜坐。齊教授即時跑去向他問候，講了幾句話，而後幫忙的護理員讓張亨躺在牀上，那時張亨教授好像聽得很吃力，覺得不太舒服。我去握他的手說：「我來了！」幸而他睜開眼睛認得我，細聲叫我名字：「金一學一主一。」我勉強跟他交談幾句話，心痛意亂，不能再忍下去，急忙跑到洗手間，一個人泫然流涕一會兒，待心情稍微穩定後，再回來病房。張亨似是在睡覺，這是我們最後的晤面。我和齊教授到隔壁休息室喝咖啡，等張亨夫人彭毅教授來。齊教授已與彭毅聯絡，不久她到了，我們相見談了很多話，之後再到病房，一瞥張亨的面容就告別，回到臺灣大學研討會會場。彭毅教授的心臟在很多年前曾開刀手術，身體比較柔弱，所以與他們夫婦相見時，我時常擔心她的健康，但現在她反而像是沒有甚麼問題。他們的年歲，我記得是彭毅和我同年，八十二歲，張亨八十四歲。

張亨夫婦不但是臺灣朋友中和我最親密的，且在我的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同期生中，他們也是唯一從學生時期就親密地交遊的朋友。一九五七年，中華民國政府向我國政府徵選四個學生，並送到臺灣留學，且支付優渥的獎學金。當時韓國教育部立即招考四個學生，我獲入選。之後，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來到臺灣，註冊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學生。所以，我可說是第一個正式成為臺灣大學中國文

* 金學主，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名譽教授。

學研究所的外籍生。研究所的課程對我來說實在很難，我的中文講得不大好，而講課以外，又有第二外語考試、學科考試，還得寫論文，完全沒有結交中國朋友的餘力。甚至宿舍同一個房間的朋友，也很少一起出遊。因此，我的臺灣朋友都是在我臺大研究所畢業後，返韓任首爾大學講師，再來臺灣時結交的。所以，我的臺灣朋友大部分是年齡比我小五六歲的，唯獨張亨夫婦是我的臺大同期同學。我在研究所讀書時，與他們相交相親，至今仍維持敦厚友誼，是我的特別好友。

當時，臺灣大學第二學期開始於三月，且規定新入學生不能正式註冊，但如有新開的科目的學系則例外。那時，恰好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施友忠教授來臺大中文系開設「文藝心理學」講座，所以我可以註冊為正式學生。與那一個科目同時，我正式申請聽講的是戴君仁(1901-1978)老師講的「經學史」，課本是用抄寫油印的清末皮錫瑞著《經學歷史》，連其〈附注〉也一起印的厚厚的本子(本文一百十六頁，〈附注〉八十二頁，目錄不算)。那時，我對中國經書讀得很少，老師所講的大都不能了解，即使讀了課本也不可能明白。出於無奈，我訪問戴老師，介紹自己是剛從韓國來的留學生，並說明「經學史」講義的難解，且舉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課本裏難解的地方很多，懇請指教解決的方法。戴老師問我：「你能讀日文嗎？」我回答：「是，大致可讀。」老師說：「毋論皮錫瑞，中國學者皆有自己的先入之見，不能客觀地把握中國經學的問題。皮錫瑞是屬於今文派的學者，課本裏面今文的偏見很多。有一本日本學者本田成之寫的《中國經學史》，你找那一本書，上課時與課本並讀即可。」我立即跑到街上舊書店，買來一本本田成之的《支那經學史論》，讀那一本書，中國經學史的大略已多可了解，戴老師的講義也大概聽得懂。我再向戴老師報告讀日本學者所寫《經學史》的效果，老師則說：「你那樣精讀，把那本書譯為中文，如何？」我隨即回答：「雖然我中文能力不足，願盡全力試一試。」我回來立即著手《支那經學史論》的中文翻譯。

我先到小賣部去，買來很厚的臺大筆記本，在筆記本上開始翻譯日本學者的《中國經學史》。又爲了請一位中國朋友校正我生硬的翻譯文章，接觸幾位中國學友，拜託他們幫忙，最後張亨同學欣然地應允了。本田成之的《支那經學史論》一共七章，各章分爲四、五節。大約在筆記本上翻了一節，就帶到張亨同學房間去，請他校正，而後修訂其文章，再謄寫於稿紙上，最後敬呈戴君仁老師指正。我翻譯時，將書名改爲《中國經學史》。此書終於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三日譯完，我將完整的稿子送到戴老師住處。現在我的書架上還珍貴地保存初稿的臺大筆記本三冊，這

筆記本一冊一百頁，三冊以外，還有十餘張筆記的草稿，是我初譯後張亨同學用鉛筆或者紅筆校正文章的草稿本《中國經學史》。看到這些鉛筆與紅筆寫的字，就想起張亨同學的真摯友情。

我開始翻譯《中國經學史》後，戴老師時常讚許我的努力和讀書熱情，並且積極地鼓勵我、教導我。此後讀書能力日有進展，我順利地選修屈萬里(1907-1979)老師的《詩經》、《書經》講座，系主任臺靜農(1902-1990)老師的《楚辭》講座，指導教授鄭騫(1906-1991)老師的「詩選」、「詞選」講座，王叔岷(1914-2008)老師的「校讎學」、「莊子」講座，獲得中文研究所畢業學分。在臺大讀書期間，我心裏以為，教我的五位老師都是活的現存聖人。不但他們的學問、諸多風度和風範，都是我的榜樣。因為他們的教導，使我可以成為現在這樣喜歡讀書的學人。

一九六一年，我得到臺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返韓擔任國立首爾大學講師。我可以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讀書，又可修難得的碩士學位課程，多虧戴老師的教導和張亨教授的幫助。我開始翻譯《中國經學史》後，不但請張亨教授訂正我的草稿文章，在讀書發生種種問題時，我也會隨時請教張亨、彭毅夫婦。我修得的研究所學分，承蒙他們幫忙很多，我應該稱他們夫婦為學兄、學嫂，不僅是單純的同學朋友。他們任教臺大中文系後，又各自指導不少韓國留學生的博士課程，與韓國的緣分更深，自然我與張亨夫婦的友情也繼續加深。

後來戴老師曾對我說，要我將翻譯好的《中國經學史》稿子送給出版社的人，再請他們修改我的文章，而後出版。戴老師曾一兩次對我說：「你的書出版太慢了。」在他去世之前，始終沒能看到此書之出版。我也惦記著我的稿子之去向。戴老師去世的次年一九七九年，臺北的某大出版社出版日本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翻譯本，但此書上沒有翻譯者名字，沒有任何出版說明，一時我懷疑是不是我翻譯本的修改本？

不論在臺灣或在韓國，我和張亨教授有許多共同的回憶，令人難忘。我每次訪臺時，張亨夫婦都請我餐敘，他們自己不大喜歡喝酒，可是他們知道我喜歡，臺北的酒黨與酒黨黨魁都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們夫婦一定會帶來一兩瓶金門高粱酒或者高級西洋威士忌酒讓我喝。

如今，我的朋友，我的仁兄先走了！可是您仍永存在我心中。謹禱您的冥福，並切望孤單的夫人彭毅心情平靜，身體健康！

2016年6月17日 金學主謹識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懷念張亨

梅 廣*

我與張亨先生相識，超過五十年，跟他在臺大中文系共事，同用一個研究室，到他退休搬出第六研究室為止，也有三十年之久。我們二家經常來往，他們夫婦是我家的常客，臨生稱張亨為老師，小兒梅安國叫彭毅彭姑姑（彭毅和我大姐是高中同學）。我們兩家不止是同事關係，還有師生和家庭關係。兩家見面的時候，通常是彭毅和臨生在那裏閒話家常，張亨偶而搭訕，我多半坐在那裏不發一語。張亨不是多話的人，我則個性內向，若非激動，多保持沉默寡言。二人同處一研究室，相對而坐，除了偶爾對世局時事交換一下意見外，聊天的時候其實很少。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交往了幾十年，不可謂不久，雖算是知心之交，然而可記之趣事則甚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恐怕亦指此而言吧！

家與學校是張亨生活的兩個重心。對於家，他更有深情。我初認識張亨的時候，他們夫婦住在一處臺大日式舊宿舍，他們只分到十多坪空間，居處陰暗簡陋。我去過他家一次，感受到他們待客的熱情，也當下覺得他們夫妻感情真好。那時候他們兩位還是臺大中文系講師，我則是中文系研究生。十年以後，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我在那年返國，回臺大中文系任教。那時張亨已升等教授，住在一處比較寬大的日式宿舍。我時往串門子。他們家很熱鬧，兒女適當童年，活潑好動，記得他的小兒還要在客人面前表演他練的壁虎功。一兩年後，臺大興建學人宿舍，賣給學校同仁，他們就搬到現在的溫州街住所。張亨夫婦的生活，給人的感覺是固定而安穩。幾十年來臺灣社會發生的大變化，似乎並未對他們發生什麼影響。他家客廳的擺設，始終就是那個樣子。沙發破了換新的，款式還是差不多，色調更是一模一樣。只有在最近幾年，我發現他家客廳掛的字畫，時有更換。臺大中文系的老先生們，也就是我們的老師輩，都喜歡張亨；大家都看重他的人品。特別是臺（靜農）

* 梅 廣，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先生和戴（君仁）先生，對張亨更是寵愛有加。臺先生送給張亨夫婦的書法，都是精品，是別處看不到的。張亨家中掛著臺先生送給他的字畫，還時常更換。

張亨人品之高，無須在此多說。但此老溫文儒雅的表面，實藏有極倔強的個性。中文系同儕或知其性格之拗，恐怕未領教過他脾氣之牛。多年前，系上一度擬由張亨接任系主任空缺。但他硬是不答應，只因為系裏有人跟他意見不合。他在中文系服務四十年，德高望重，然於系務人事竟無所獻替，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這不是狷介，而是執拗，帶有意氣成分。

我曾冒犯過張亨兩次，因此領教過他的牛脾氣。一次是清華中文系的聘任案，我把他極力推薦的人選否決掉了。這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錯在我不該打電話給他。他聽到我的聲音便勃然大怒，說我來興師問罪。接著我收到他一封措辭嚴厲的絕交書。我只好回他一信，說明我打電話背後的原因，並懇求他諒解。過了很久，他的氣才消下來。

另一次是與學術討論有關的。宋儒解《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為忽略了兩個「焉」字在句中的作用，以致把一個實然命題誤認為是表非實然的條件句，也就是說把一個本體的論述看成是修為實踐的指令，於是理學家就天天在家研究怎樣去致中和。朱子有參中和的舊說和新說二篇，是宋代理學的重要文獻，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後來醒悟了，四十一歲以後就再也不談未發、已發的問題。我最初在一個小型討論會中提出這點宋儒對《中庸》文義的誤解，並且說參中和是朱子一生最痛苦的經驗，引起張亨大不滿。他疾言厲色的說「我不贊同你的說法」，好像我在汙蔑聖賢，令我十分尷尬。那時我才剛開始做先秦思想研究，得不到他的信任，是很自然的。不過，以後我還有機會在不同場合申述我的觀點，他都不置可否。慢慢地，他也習慣我的一些看似離經叛道的想法，甚至予以嘉許。於是我也成了他的一個「學雖殊轍，道則同歸」的道友。

我感到張亨有一股沉靜的力量支撐著他的生命和學問。因為沉靜，所以不覺得精彩。然而他最後的兩篇力作〈說儒家〉、〈說道家〉，不就顯出他在思想研究的深厚功力嗎？看他最後的日子與病魔的纏鬥，就知道他的意志力多麼強勁。他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他捨不得離開他的家人。他對家庭的愛，對他妻子和子女的愛，以及他甘願忍受衰疾痛苦的決心，都不是常人能及的。每次他從醫院病房回家，我都豎起大拇指說他了不起，而他也報以勝利的微笑。貞剛之質，玉石非堅。他給人留下的，是一個充滿深情、堅忍不拔的儒者形象。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永遠的君子

莊 因*

五月中旬，彭毅大嫂自臺北打電話來，告知張亨學長走了。乍聞之下，一時竟不知如何得體回應。事後，匆匆寫了一紙短箋給她，卻仍感覺言不及義。而今接到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月惠女士的電郵，稱說該所擬出刊「張亨教授紀念專輯」，向我約稿。我未假思索，當即一口允諾，因為有了可以表露我與張亨學長交往數十寒暑的一腔肺腑之言了。

我自臺大本科畢業，後續服了一年的預備軍官役後，脫下戰袍，重返母校，恢復自由之身的學院生活，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開學那天，我去文學院向中國文學研究所報到註冊，在文學院前樓樓下左翼長廊側門的門口，遇到了未識的張亨學長。他正與其夫人彭毅大嫂步出側門下階。一向看來稍嫌孱弱的彭大嫂，許是邁步腳失衡，眼見緊隨其後的張學長，剎那間伸出快手相扶。屹然、誠篤、慎莊的他，在我心中烙下清新的君子形象。

誠篤、慎莊、雅和有容，本來就是君子的品貌，而張亨學長的屹然岸立身材，加以中年後的一頭亮潔白髮，更把君子形象突然到另一空間去了。一般君子，不免令人有外界甚至本人的表飾之感，並不十分自然。張學長所留給我的君子形象，則十分謙和自然，好似文人的一幅淡斂的自畫像。

我在研究所就讀期間，仍吃宿舍的大鍋伙食，仍是與人同室，只不過由八人一屋的上下舖，換成四人一屋的單人舖而已。住房由樓下遷移樓上，算是正式升級了。在這種情況下，張、彭伉儷學長遂不時在周末邀約所中的幾位單身小老弟，去他們座落於潮州街上狹隘老舊且低矮的臺大教職員宿舍，備薄酒盛饌，饗以大蒜黃魚、紅燒肉、清燉雞湯及小鍋小灶小炒，盡情款待幾位後學。每當主人向我們舉酒

* 莊 因，美國史丹佛大學退休教授。

時，我都在男主人的身上，尤其看見了學長肅靜平和面上的君子彬顏。

君子所予人的另一面，大約就是謹言慎行了。張亨學長予我的印象，是從不夸其言，以顯露個人的重要。一般來說，他是相當沉默寡言的。與人相談，都誠懇以對，沉靜聆取而鮮少放言。在我與他生前交往的數十年中，似乎還沒有一次見他主動侃侃而談的。只感到他誠摯謙虛對待對方的尊重。我這樣說，絕不誇張。他對於自己的後事十分低調，甚至不希望公祭，就是不願驚擾別人的佳例。

進入古稀老境後，友輩中先我而去仙鄉的人多矣。但是，似乎尚無如張亨學長那樣，帶著永遠平和自然的君子形象站立在遠方的人。

2016年7月5日於酒蟹居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萬丈豪情在眉宇間

黃俊傑*

—

上個月蔡振豐兄打電話告訴我，張亨老師已在臺大醫院安詳辭世，我雖然知道張老師近年來久為病痛所苦，但驟聞這項訊息，仍然震撼良深，久久不能平復。

參加張老師的告別式回來，半世紀前的種種往事襲上心頭。我在民國五十四年考上臺大歷史系，南部鄉下的學生來到臺北，對大學生活充滿了興奮的期待與想像。開學第一週上「大一國文」課，教我們的是年輕挺拔、英俊瀟灑的張老師。幾年後我才知道，我們那一班是張老師教歷史系「大一國文」的第二年所教的學生，所以，我們自稱是張老師的「黃埔二期」學生。

張老師教我們「大一國文」的年代，雖然只有三十四歲，風華正茂，但對十七、八歲的大一新生而言，是我們仰望的師長，他講課時字正腔圓，溫文儒雅，但我們對他的印象卻是「萬丈豪情在眉宇間」！五十一年前的時光流逝，但當年在現今已拆除的六號館教室上課的情景，恍如昨日，歷歷在目。我至今不能忘懷的，是張老師為我們講《史記·項羽本紀》時，為項羽這位悲劇英雄的結局，所流露的不勝哀惋之情。在張老師講解課文時，項羽的人格與風格如在眼前，栩栩如生。我在高中時代自己閱讀《史記》的本紀與列傳部分，就被太史公司馬遷的文筆所吸引，最同情的歷史人物就是項羽與荊軻，對項羽之自刎於烏江邊，以及荊軻刺秦王失敗後擲出匕首，太史公寫下：「不中！中銅柱！」的情節，為之扼腕不已，感嘆歷史之無情。所以，當年上張老師的國文課，對於張老師講〈項羽本紀〉的情節，特別感動。當年「大一國文」每學期要寫許多篇作文，我交的報告之一就題為〈項羽性格

* 黃俊傑，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之分析〉，雖然因為融入太多的個人感情而不成體製，但是，這是我所寫第一篇歷史文章，生澀可笑，但也得到張老師的勉勵與謬許。

記得那一年上課時，有一天老師講課談到漢武帝時代的歷史，他說〈李陵答蘇武書〉是後人偽作，並不是李陵所親撰。第一次聽到這種講法，我內心震動，感覺上像頭部受到重擊。我在高中時代背誦了一些古文，〈李陵答蘇武書〉正是我最受感動的文章之一，對李陵的冤屈，我非常同情，對〈答蘇武書〉中文句：「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琅琅上口，深有同感。所以，當年一聽張老師說這篇至情至性的文章是後人偽作，完全不能接受，下課時還去向張老師請益，有所爭辯。張老師聽我講完後，以非常平和沉穩的口氣回答我說，這篇文章確實不是出自李陵之手。經過這一次的問題，使我對「歷史判斷」不能過度受到個人情感之支配，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對於張老師當年的教導，至今感念在心。

因為「大一國文」課的影響，我從大二開始，就選修或旁聽了許多中文系的課程，包括屈萬里先生的《尚書》、何定生先生的《詩經》、戴君仁先生的「宋明理學」、金祥恆先生的「甲骨文」等。後來考上研究所，在碩一的時候我也上了張老師開授的《荀子》。張老師當年開授《荀子》課程，授課主要內容以訓詁考釋與解明文意為主，但那幾年正是我對社會學產生極大興趣的年代，所以對老師講授內容不太相應，未能學到老師當年第一本著作《荀子假借字譜》中的工夫，至今思之甚感慚愧。當年跟張老師學習《荀子》，記得學期報告寫了一篇〈荀子的社會思想〉，胡亂套用一些剛剛囫圇吞棗學到的涂爾幹的學說，現在想來覺得非常汗顏，但當年張老師對學生的嘗試，一直鼓勵有加，我非常感恩老師的寬容。

那一年在老師的《荀子》課堂的同學，還有今年剛從夏威夷大學哲學系退休的安樂哲 (Roger Ames)。當年上《荀子》課的教室是在只有兩層樓的舊普通教室，現在普通教室早已拆除，蓋了巍峨的教學大樓。我現在有時走過普通教室新大樓時，偶而會浮起當年在同一地點聆聽張老師講《荀子》的記憶，而今張老師已經離我們遠去，思之不免淒然！

二

幾十年來我最感佩的是張老師對學生與晚輩發乎內心的關懷。我記得大約在民

國六十九(1980)年秋間，我初識兩位當時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有一次向張老師問學之後，我無意間提到這兩位優秀學生，張老師馬上說，如果剛好知道有付稿費的刊物，可以建議他們去投稿。後來張老師又告訴我，如果知道國外的大學有可以申請獎學金的機會，請立即告訴這兩位學生。記得大約民國八十五(1996)年春間，臺大舉辦一個有關經典與通識教育的研討會，張老師來參加，老師以前的一位學生也來參加，相談非常愉快。在研討會結束後，張老師告訴我說，他覺得這位同學健康欠佳，所以要陪他走到校門口坐車，我因為必須照顧會場，所以沒有與他們一起走。想不到就在這一年的夏間，這位同學突然往生，從此天人永隔，抱憾不已！

一九九八年起，我承乏的研究計畫開始啟動，校內外參與學者較多，記得那段時間張老師在美國講學，我常打電話到美國，向張老師報告研究計畫相關工作，也得到他很多指導與鼓勵。從民國五十四年走進張老師所授「大一國文」的教室，半世紀以來常常得到張老師在學問與處事上的關懷與啟迪，感念之情，實難言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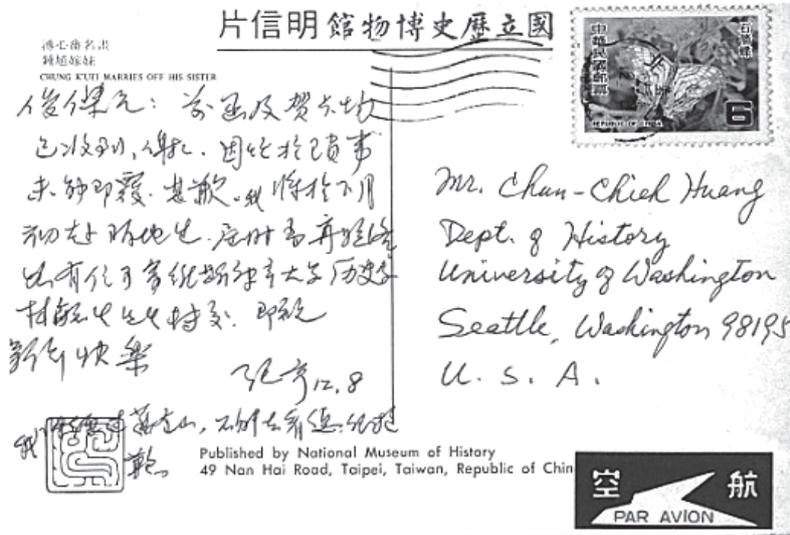
最近二十年來，我大約每年都開授通識教育課程，面對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大學生，我常常想起我自己在大學時代，所受到張老師以及其他老師的關懷與教導，提醒自己要學習張老師與教育典範，以愛心從事教學工作。

三

張老師畢生關懷中國文化的未來，記得他退休多年之後，我有一天接到張老師打來的電話，他很急切地說到應該成立中國哲學研究所，以延續中國傳統思想的命脈。我向老師報告申請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所曠日廢時的複雜程序，兩人都為之悵然！

遙想一九六五年進入臺大求學，走進張老師的教室，迄今竟然已經超過半世紀，正如一首歌曲的歌詞所說：「青春時代遇到了你，而今髮已白……。」時間之無情莫過於此！張老師，雖然您的軀體已遠離我們，但是您的人格與風格，永存於學生們的心中，一直引導著我們生命的方向！（2016年7月4日）

寫完此文，昨日整理舊書，打開三十幾年前的一本英文小書，書中竟夾一張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張老師去 Madison 之前寄來的明信片，不免觸動心緒。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那個時代在臺大有一位張老師

黃榮村*

從沒忘掉過的大一國文課

對張亨老師的印象真的就是謙謙君子，獲益最多的是在大一國文課上，共讀《左傳》，記得還有《史記》吧！《春秋》哪有那麼容易理解，但是像〈鄭伯克段於鄆〉，以及母子弄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的困境，最後才想到可以挖地道闕地及泉，母子隧而相見之類的記述，故事性十足；怪不得《古文觀止》會將其放在篇首，真是適合當語文與文學閱讀，對文字的精鍊性與表現方式也有所體會。這種經驗是高中時所沒有的，讓人大開眼界。

另外一件就是交作文，已經弄不清楚一年要寫幾篇了，張老師會讓你感覺他好像從閱讀大家的作文中，嘗試了解我們，不時表示一些讓你一生中不容易忘掉的意見。我們班上好幾位傑出的女同學，每次發下批改過的作文時，上面都有一串圓圈圈，沒十個也有八個，後來有成為名作家與文教機構負責人的；男同學則大部分是進步獎，從四個小圈圈開始，越來越進入佳境，激勵人心未曾有出其右者。我剛進臺大時讀的是歷史系，一年後就轉到心理系去，但待在臺大的時間很長，所以後來還是會在校園中偶而碰到張老師，碰到總會閒聊兩句才離開。但是，這次是真的走了。

大一之後，一晃居然已經五十來年，很多事情開始記不清楚，好在我們當年同班同學大部分讀完全程，像邢義田、黃俊傑、古偉瀛、陳秋坤、張永堂等人，後來都在國內史學界發光發熱。他們與張老師有更多的互動，其中古偉瀛記得最多（因為他小時是天才兒童，一路跳級，低我們兩歲），他說：「當年在六號館上

* 黃榮村，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課，上《史記·淮陰侯列傳》，聽到當時處刑，動不動就『烹之』（古字為亨），與老師名字相似，不覺好笑，當時覺得張老師身材高大，溫文爾雅，教起課來真迷人。天下有這麼溫柔謙虛的男人。……張老師後來專攻《荀子》，常常旁聽其他學者的課，記得梅廣從哈佛回臺開課，我們都去旁聽，他也在。」這一段話是有所本的，《史記》寫說，在呂后夷韓信三族，漢高祖回來後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

一提起這一段，就想到在那個時代當為一位真英雄的宿命，韓信若個性如張良說不定可以保身，但卻當不了被百般惋惜與懷念的開朝英雄，所以只好在命運無情的擺弄下，流下連史書都不願書寫的英雄淚：

〈韓信英雄淚〉

明知高鳥已盡良弓應藏

仍然迷信路旁小兒指指點點

虛幻的國士無雙歌聲

要與亭長試比高

功臣氣盛就以血償還

枉費流下多少英雄淚。

依古偉瀛的說法，當年臺大以師承北大遺風為職志，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就訂出大一國文課，要先修《史記》，再讀《左傳》，輔以自學美學講義。所以我們當年國文課是有一點博雅經典的做法，《史記》與《左傳》又那麼具有故事性，讀上整整一年也讀不完，但先決條件是要有一位會說書講道理又能解密古文的老師，才能竟其全功。現在想想，好像也沒有比這個課程內容與講授者更好的組合了，想起古人所說「典型在夙昔」的講法，雖然並不是說今日就找不到這種老師，但最重要的是讓我們透過歷史通道，沿著古道，一路想像當年張老師如何的在我們青春年少的心靈上著色。

張老師的風範與啟蒙

張亨老師在今(2016)年五月下旬辭世消息傳來，我們幾位當年歷史系同學，就在班網上寫一些懷念的短信，就像二〇一〇年初《麥田捕手》作者 J. D. Salinger 過世時，我們興起了一股濃濃的大一鄉愁與失落一樣（因為在大一時，我們同班同學有志之士幾乎人手一本《麥田捕手》，讀詩、聽演講、看畫展、聽 Bob Dylan 的歌）。我終於逐漸想起了一些事情。

臺大校園那時應該是蠻追求西方風格的，《史記》與《左傳》何以能捕獲我們年輕的心？除了前面講的原因之外，可能有其時代氛圍。大一時，正是大陸發動文革(1966)的前一年，臺灣社會上的政治氣氛則幾十年來，一直都是相當苦悶又不容易找到認同。那時，臺大只有文、理、法、醫、工、農六個學院，但學生選課相當自由。我在大學就真的修過六個學院的課，校園內則流行著各式思潮，包括存在主義、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論與邏輯經驗論、行為主義、精神分析、地下文學、搖滾樂、當代藝術思潮之類，那時大概也埋伏了一些職業學生，在觀察這些聚會活動，不過，校內也沒人會在意這些事情。但是，後來發生了臺大哲學系事件(1972-1975)，才驚覺當年是太過天真不知險惡了。我們很多人來自中南部與東北部，那時臺灣普遍貧困，在校園中不太會講究出身，舶來品也很少在校園出現；那時講的是誰有才華，誰是聰明人，誰若能一邊演算微積分與物理題目，一邊又弄懂《老子》與《莊子》，若能再打得一手好籃球，那就是校園極品了。在這種氛圍下，有一位老師英挺、安靜、迷人、娓娓道來，又對學生愛才惜才溢於言表（一直在作文上加圈圈），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啟蒙。充滿故事性的《史記》與《左傳》，對我們高中整天要念《四書》的人而言，簡直就是荒漠甘泉，也打開了我們年輕自由的心靈。

再談為人師者的風範。我曾交一篇作文，寫張健詩集的詩評。張健老師我一點都不熟，是張亨老師在中文系比較年輕的同事，講授有關中外古今詩歌與文學，同時也是藍星詩社主要成員。我後來了解張老師多年開設中國思想史課程，並於研究所開設中國思想專題研究、《荀子》、先秦諸子概說、《易傳》與《中庸》、《近思錄》與《傳習錄》、先秦諸子論心專題、《莊子》、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課程。因此，可以說兩人的專長與品味是各自大有不同，但他認真地看了我的作文，還批註說：「真希望中文系有你這種學生。」有一種老師是一輩子令人懷念的，他對年

輕同事的成就樂觀其成，再加上前面古偉瀛說起一齊聽梅廣上課的往事，我想他是那種心胸開闊，與人為善，且時時以學問為重的學者。但後來我聽說張老師在想要回復人間與學術正義上，又頗有分寸與堅持，這些與我後來看到他白髮、低調、堅毅，但又鬱鬱寡歡的混合形象，是相容的。

張老師對回復正義之作為默默支持的事實，我後來在協助籌組臺大教授聯誼會時也有點了解。那是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籌組的臺灣第一個教授聯誼會，在敏感又具有關鍵性的會議及成立大會上，我有時會看到他默默支持的身影。那時的臺大已有非正式的四大寇組合（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也是一九八九年成立澄社的重要創社會員，但他們主要是在外面努力臺灣的民主運動。倡議在臺大籌組教授聯誼組織，則是黃武雄提出的（後來我歸納出這是他解放集體心靈系列工作中的第一擊，隨之則是一九九四年想要解放中小學的四一〇教改，以及之後以解放社會為職志的社區大學），但在解嚴前，由於還在戒嚴鬆動的敏感期間，籌設過程仍是風波不斷，校內校外的阻力陸續介入，我是在正式成立前一兩個月才全力協助這件事。四大寇當時都出席成立大會，很多資深又有良好學術聲名的老師前來支持（這是臺大一向的傳統），更難得的是文學院的參與也算踴躍，以歷史系為主中文系為輔，後來張忠棟還當了第一任會長。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情境下，我看到了張老師的身影。雖然我一直想問夏長樸是誰請他參加的，但我都忍下來不問，因為這樣就表示我不太尊重張老師（雖然他不會介意），他一向是心中自有溪壑的，他是為了臺大的未來而來的。

我後來因為一直在理學院，對文學院了解得較少，但我相信以張老師的風格，一定會在文學院中展現一種低調但堅持的風格，這是老式文人令人難忘的情操吧！我雖然想循這個思路想下去，但時空之門已經關閉，我的思念是道阻且長，穿不透歷史的迷霧，已經看不清楚張老師的一生，留下的是他曾照亮過的道路，路上看得到我們塗過的顏色，還有張老師幫我們修改過的痕跡。

請校園蟬聲送張老師一程

六、七月間走入臺大校園，忽然一片蟬聲迎面而來，讓人措手不及，一下子就回到過去。回想離高中還很近的大一時代，當空氣開始變熱時，兩樣形象最鮮明的就是蟬聲與鳳凰花紅，好像在預示著即將離別，也是學年即將結束之時。我們有

時間就到六號館旁邊的小福（也就是後來臺大學生活動遍地烽火時，常開校務會議與協商的地方），吃根冰棒，看看張老師發下的作文，誰的圈圈多，談談詩歌與文學，日子曾經這麼有趣過。現在張老師已經走了，我想他晚年在六、七月間的臺大校園散步時，一定也會聽到一大片如潮水般的蟬聲，再配上熊熊烈火的鳳凰花影，不知他有沒閃過一些影像，印象中有我們當時年輕的身影？就替張老師想像一下，把我們對他的思念也融入到蟬聲與鳳凰花影中，替老師送行吧：

晚年聽蟬已近黃昏
那蟬聲竟然可以悠閒的
將各種思念
化成一根根在河邊風中
搖擺不已的蘆葦
一弦一柱
追憶起似水年華，
那仍然燦爛的鳳凰花群
欲言又止
在飛鳥的牽引下逐漸遠離
轉化成為天邊戀戀的背景。

July, 2016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從臺大舟山路到新店光明街

趙天儀^{*}

一、臺大舟山路宿舍同事及鄰居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是臺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兼助教，當時先後擔任助教者如下：

- (一) 黃季媛助教，辭職，因日語很好，進入亞東關係協會工作，在東京上班。
- (二) 徐頌鵬助教，在美國獲哲學博士學位，曾經回臺客座一年。
- (三) 許登源助教，學電腦，進入美國銀行工作。
- (四) 趙天儀助教。
- (五) 何秀煌助教，在美國獲哲學博士學位，專長邏輯、分析哲學、倫理學。到香港中文大學工作。
- (六) 鄭學禮先生，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校（夏威夷大學）任教。

二、臺大舟山路宿舍

美軍在舟山路宿舍旁站衛兵，看到我們家兩個小孩，會送巧克力。

第一家，沈教授，獸醫系。

沈太太，曾任教銘傳國小。

沈純真，臺大中文系畢業。

沈希哲，醫生。

沈明哲，醫生。

* 趙天儀，靜宜大學臺文系退休教授。

沈太太很疼我們趙郁芬。

第二家，趙天儀。

詹秀金。

趙郁芬，唸幼幼幼稚園，在溫州公園。

趙育靖，尚未唸幼稚園，搬新店光明街才上幼稚園。

第三家，葉慶炳教授，後來葉老師搬走。

葉慶炳夫人。

兒子。

女兒（學音樂，在臺大中文系任教）。

後來由謝質高先生搬來住。

第四家，張亨教授，專長中國哲學思想，儒家。

彭毅教授，專長中國文學思想，《楚辭》。

兒子龍龍（張時）。

女兒妞妞。

我們鄰居都非常照顧我們，張家伉儷後來搬到臺大溫州街宿舍。

第五家，徐昭，臺大醫院護理師。

徐昭先生，東元經理。

女兒阿輝哥（黃競慧，醫生）。

兒子倫倫（黃倫倫，醫生）。

第六家，呂先生，臺大總圖書館工作，因病逝世。

呂太太。

有三個女兒，第三女兒與趙郁芬年齡相近，極友好。

第七家，曹永□先生，臺大醫院伙食中心工作，曹永和親戚。

我們住臺大舟山路宿舍時，兩個孩子與我常常去汀洲街一位老醫生那裏拿藥，老醫生勸我們要搬住到空氣好的地方。

因我三弟趙天祥一家移民巴西，我們去松山機場送他們。當天我們一家四人去新店看房子，新店光明街二〇〇巷，我們決定買下來，並搬去住。

在新店，有藍醫師、藍玉仁（臺大哲學系）、藍世明為鄰居。他們幫助我們很多。

三、臺大哲學系事件

一九七四年，臺大哲學系大整肅，八月：

- (一) 趙天儀（離職）。
- (二) 王曉波（轉國民黨陸工會，陳鼓應早一年離開）。
- (三) 李日章（離職，可讀《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
- (四) 梁振生（被當小偷，離職，返馬來西亞）。
- (五) 胡基竣（離職，旅美）。
- (六) 楊斐華（離職，輔大博士班，因病辭世）。
- (七) 鍾友聯（任國中教師）。
- (八) 黃慶明（文化大學博士，系主任）。

我當臺大哲學系系主任，唯一聘任案：

- (一) 黃懿梅，成績八十分以上（主修中國哲學，中文系夏長樸夫人）。
- (二) 陳淑芬，成績八十分以上。
- (三) 游祥洲，成績七十二分。

系務會議中黃懿梅第一名，聘為助教。我在臺大哲學系唯一人事任用。

成中英、林正弘、劉福增會議中主張以研究中國哲學者為優先。

四、拜訪張亨及彭毅教授

我們在臺北拜訪張亨及彭毅教授，我在臺大，或離開臺大，以及在國立編譯館（現在改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常得到他們的照顧。

我也認識了楊儒賓教授及胡森永教授，胡森永還到靜宜大學中文系任教，並為同事。

告別式那天胡先生主動來握手，令人感動。

- (一) 張亨老師與彭毅老師贈書給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由趙天儀轉交。
- (二) 靜宜大學舉行學術演講，傅偉勳、韋政通、楊國樞、齊邦媛、朱立民、李敖都來演講，胡森永也請張亨老師來演講。
- (三) 楊維哲的兒子楊柏因、齊益壽的大女兒與我們趙郁芬都唸了溫州公園的幼幼

幼稚園。

(四) 在臺大傅鐘附近，臺大圖書館系的一位女助教跟趙郁芬說：「妳是這裏最幸福的小女孩。」趙郁芬臺大哲學系畢業以後，曾經留學法國巴黎一年，學習法文與繪畫。後來結婚以後，到紐西蘭南島基督城學電腦，已留居十八年了。彭毅老師喜歡內人詹秀金與女兒趙郁芬，令人欣喜。

臺大中文系有臺靜農、屈萬里、葉慶炳、龍宇純、張亨、彭毅等教授。朱立民後來同意了屈萬里聘龍宇純為系主任。其他系主任：臺大外文系顏元叔、臺大歷史系孫同勛、臺大考古系唐美君、臺大圖書館學系周駿富、臺大哲學系趙天儀。李邁先代朱立民為文學院院長一年，不幸發生了臺大哲學系事件，我失業了一年，後來由教育部次長朱匯森先生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今已改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五、回憶與結語

(一) 毛子水教授，九十多歲，帶著一把雨傘，到國立編譯館研究室來看我，幫助我。

(二) 朱立民院長與屈萬里主任，推薦我給國立編譯館審查一本書，他們兩位都來看我，並表示欣賞。

(三) 朱立民院長與顏元叔主任，安排我到淡江大學西方語文學系演講現代詩。

(四) 教育部次長朱匯森先生接見我時說：「趙先生，你的風評很好，請你到國立編譯館幫幫忙。」

(五) 我到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報到，主任齊邦媛先生說：「你現在是驚弓之鳥，要韜光養晦，好好上班，不過，你不要告訴人家，你是我的學生。」後來，我以臺大十年，國立編譯館十七年，第一次申請退休。

(六) 我受靜宜中文系主任鄭邦鎮老師的邀請，到靜宜大學中文系任教，教「中國思想史」、「兒童文學」等課程，並任文學院院長。臺大哲學系事件平反時，我已六十四歲。所以我依臺大平反的辦法，在臺大取得退休教授，並領補償金六十萬元。我內人再補以四十萬元，共計一百萬元，在靜宜大學成立「趙天儀文學獎學金」，補助臺灣文學研究與創作。

(七) 張亨教授推薦胡森永先生，彭毅教授推薦魯瑞菁先生，都到靜宜大學中文系任教，並都兼系主任，加強了靜宜中文系陣容。

（八）我兒子趙育靖，士官學校四個月，裝甲兵學校兩個月，以及三年六個月在裝甲兵學校從下士到上士，擔任助教。四年滿，要退伍時，軍校派人來慰留。我告訴兒子說：「如果你要留，可考慮再去唸軍官學校。」

（九）張亨伯伯，彭毅媽媽都非常喜歡，並照顧我們家兩位小朋友，在此表示感激與謝意。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風景舊曾諳——懷念張亨先生

齊益壽*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我陪韓國首爾大學名譽教授金學主學長，一起到臺大醫院舊址二樓病房去探病，看見坐在輪椅上骨瘦如柴、形萎體縮的病人，我們第一眼都未認出他就是張亨教授。

他顯得很高興看到金教授——一甲子前念臺大中文研究所時的同窗。印尼籍看護在旁邊帶著笑容看著我們，說張先生前一天晚上得知老同學今天要來，就一直興奮不已。然而張先生說話的聲音非常微弱，我儘量將耳朵湊近，仍無法句句都聽清楚。大約十分鐘後問他是否疲倦？需不需要到床上躺下？他點點頭。於是看護將輪椅推向床沿，抱著他慢慢站起，慢慢在床邊坐下，再兩手托著他的背和腿，慢慢把他放下，然後解下他的護腰，蓋上薄被。躺下之後，他又跟我們說些話，聲音仍然極為微弱，不久就闔上了眼睛。我們跟看護說先讓他休息，我們出去一下再來。

在樓下走道一側的咖啡室點兩杯咖啡。我坐在面向走道的位置，以便張先生的夫人彭毅教授等一下經過時，可以看到。果然，剛喝完一杯熱咖啡的工夫，彭先生跟他的女兒已從家裏來到醫院。看到我們，彭先生先讓女兒上樓到病房去，自己則坐下來跟我們談起張先生甚為嚴重的病情，口吻卻是平和的，並不激動，似乎心裏已有坦然接受一切的準備。不久，我們三人一起上樓，張先生這時張開了眼睛，精神似乎稍稍好些，他微弱的聲音，經由彭先生的轉達，效果好多了。我很高興聽到他說前些時候常常翻讀陶淵明詩，有時便跟彭先生討論起來，準備以後再深入研究。彭先生緊接著說：「確實這樣。他有看法或心得就會跟我分享，有時候我們也一起討論。」我這時感到心裏一亮，好像抓住了一線希望似的，便給病人打氣說：「那太好了！我這些年對陶淵明也有一些看法，是過去所沒有的，可以一起討論。」

* 齊益壽，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等張先生病好了，我們就開始吧！」其實我更想告訴他的，是想送他一本拙著，才出版不久的陶淵明論文集，希望將來能聆聽他寶貴的意見。然而看到他如此之虛弱，連一本書恐怕都拿不動，只好把快到嘴邊的話吞了下去。

離開病房後，我送金學主學長回臺大繼續開研討會。聽說到了下午，金學長實在忍不住了，一個人離開會場，到洗手間把門關起，放聲大哭。他第二天就要離臺返韓，心裏大概掠過不祥的陰影。張先生是他每次來臺都要見的老同學，這回看見他如此枯萎虛弱，只怕會成為最後一面吧？我對張先生的病情，雖然也覺得凶多吉少，但還是心存一線希望。在他病床邊聽到他想深入研究陶詩的淡定神情，我感受到這是一種境界，一道風景。這風景我似曾相識，有些熟悉，也有些模糊。於是往後的幾天，我在散步中，或在發呆時，會從記憶的碎片中，尋檢與張先生有關的蛛絲馬跡，看看能否將曾經熟悉的感覺，拚貼出比較清朗的圖像來。

第一次見到張先生，也同時見到彭先生，是一九五八年我就讀大一時，地點竟是淡江文理學院夜間部。我有一位初中同學，大學聯考考入淡江，他告訴我葉嘉瑩教授在城區夜間部開「杜甫詩」，很值得一聽。我是來旁聽葉先生的杜詩課，而遇見同時來旁聽的張、彭一對情侶。張先生高我六屆，那時應該剛剛升上碩士班三年級。彭先生高我四屆，應該是剛剛考入碩士班一年級。張先生英英年少的模樣，彭先生清秀樸素的模樣，至今都還記得幾分。

大學畢業後，我也考上研究所，還兼了助教，跟系上的老師以及研究所的學長都愈來愈熟了。張、彭這對情侶這時已留系擔任講師，並且結了婚。兩人都熱情好客，隔不多久，他們的宿舍便笑語喧嘩，熱鬧極了。他們先住在潮州街，然後是和平東路一段，這兩處都是臺大的單身宿舍，廚房、浴室、廁所都是各戶共用的。當時年輕的教師結婚後申請眷屬宿舍很不容易，等上十年也未必配到。而申請單身宿舍則不困難，但每戶只配一房，房間的大小有六坪、四坪及三坪之別，外加一個儲藏櫃而已。記憶中張家最熱鬧的時光還是住在潮州街的時候，房間有六坪大，那時鄭再發、王雪真一對學長學姐，丁邦新、莊因等學長，都還沒出國，我成了在座中的小老弟，他們開起玩笑或說到好笑的事，那宏大又結實的笑聲，真可以聲震樑柱！那時大家都窮，助教的薪水每月才九百元新臺幣，講師多不了三兩百，然而卻窮得那樣開心。不但年輕的講師、助教、研究生如此，即便是教授級的老師們，一個月薪水也才兩千多，多半入不敷出，須靠私立大學的兼課鐘點費貼補，可是每到系裏聚餐的時候（幾乎都在西寧南路的會賓樓舉行），只要臺伯簡（靜農）老師、

屈翼鵬（萬里）老師、孔達生（德成）老師以及張清徽（敬）老師等幾位在座，那一陣又一陣的笑浪，簡直把整個餐廳給淹沒，豈止是臺、孔二師聲如洪鐘而已哉！

臺、屈兩位老師平常上課都比較嚴肅，臺老師在課堂上從不說一句題外話；屈老師則會準備好幾段笑話，不但內容年年一樣，而且每段笑話的落點處都分毫不差，像《詩經》講到某一首詩，《尚書》講到某篇某段，相同的笑話就會出現，這是回鍋聽他講課的人說的。然而這兩位老師在聚餐時，簡直判若兩人，臺老師機智敏捷，妙語如珠，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屈老師喝酒時磨功驚人，他會笑咪咪站起來轉來轉去，逗這個喝，逗那個喝，等人家回敬他時，他就跟你扯東扯西，不鬧個十來分鐘，是很難讓他一杯下肚的。張清徽老師是女性，但聚餐時其他老師並不對她有性別優待，而張老師好像也忘了自己的性別，捉弄起鬪，豈止不落人後，更是一馬當先，她最喜歡捉弄孔老師了。有一次她竟像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般的高興，因為她發現有一位同輩親友，竟然大了孔老師一輩。從此經常當我們這些學生的面，要孔老師「喊姑姑！喊姑姑」，而孔老師總是「呵……呵……呵」開懷地笑，卻不落入她的圈套。在眾老師中，孔老師最年輕，是小老弟，而他「孔聖人」的尊號，是別人無法僭越的，然而「孔聖人」卻成為餐桌上老師們最喜歡開玩笑的對象，孔老師不但不以為忤，而且還十分懷念。當屈、臺、張幾位老師都一一走了之後，孔老師跟我們這些老學生每月都聚餐一次，餐桌上不時會看到他難掩落寞的神情，有一回還脫口而出，說道：「真懷念跟臺老師們在一起的時光！」

我是大學畢業服兵役一年後，於一九六三年成為研究生兼助教的。當時周遭環境甚是險峻，國際間越戰已打了八年，後來更拖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方才結束，整整打了二十年。我們島上則從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撤退來臺即實施戒嚴，這時我們生活於戒嚴令下已有十四年之久，舉凡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有所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國旅遊禁、大陸出版品禁等等，此戒嚴令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才宣布解除，竟實施了三十八年之久。當時教過我的老師們，除了洪炎秋老師為本省籍外，其餘全是來自大陸，其中有的是隻身來臺，父母兄弟妻兒全留在大陸；有的是一家中一部分來了臺灣，一部分留在大陸。我們學生一輩來自大陸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時誰不想念自己的家鄉？對自己的親人，誰不是時時牽腸掛肚的？但既無法相見，連音訊都完全斷絕！大家心中的鬱悶可想而知。在餐聚時，藉點酒力，大家戲謔作弄，搶說笑話，博得轟然的笑聲，的確可以紓散一些苦悶，讓心情輕鬆一些。

張家的熱情好客，住在單身宿舍時便已如此。一九七〇年後終於搬入了二房一廳的眷屬宿舍，有獨立的廚房及衛浴設備，位在與校園僅有一路（舟山路）之隔的僑光堂（今名鹿鳴堂）後的巷子裏。這時候張家的客廳裏似乎更為擁擠了，而來客多半是比我低好幾屆的學弟學妹們。張家的水餃皮全是男主人親自擀的，所包的餡則頗有變化，其中有小白菜和白蘿蔔的餡，風味之美，至今在我舌尖上記憶猶存。

我有幸做過張家的鄰居，那是他們還住在和平東路一段單身宿舍的時候。我們中文系同事陳修武教授那時還是單身漢，申請到張家隔壁四坪大的房間，但因為要替一位出國的朋友照顧一棟公寓，這單身宿舍的房間便一直空著，熱心的彭先生便要他把房間讓給我。我那時結了婚，有了女兒，在外面租房子，沒有申請單身宿舍，而在空等著眷屬宿舍的分配。修武兄一口答應後，我就成了張先生和彭先生的鄰居。後來他們申請到眷屬宿舍搬走了，我便搬進他們六坪大的房間，外加前人私自加蓋的一間一坪半（三蓆榻榻米）的書房，是緊貼著房間的一扇窗子，離地加蓋的，地板下面用些柱子支撐著。當時社會尚未興起「豪宅」之詞，我住進後頓時頗有如入豪宅之感，因為六坪的大房間，已被紙拉門隔成一房一廳，前半四蓆為客廳，後半八蓆為臥室，加上緊貼著臥室窗臺的三蓆的書房，在樣樣匱乏事事克難的年代，能擁有迷你型的兩房一廳，已經使人非常滿足了。況且房間正好坐落在走道的盡頭，早被以前的住戶用木板從走道隔出一間廚房，下有臺階通向七八十坪大的院子。院中除一般的花木之外，還有枇杷、紅心石榴等果樹，非常安靜，少有人來，而三蓆大的離地架空的書房，像個大鳥窩，在綠蔭掩映下，正面對這個院子。雖然這個號稱「大雜院」的單身宿舍，廁所、浴室都是公共的，但一個小家庭能享受近百坪的碧綠而安靜的空間，已經夠奢侈了。

住進「大雜院」對我而言，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出乎我的意料。是彭先生的熱心，修武兄的大度，張先生的提攜，才使「意外」成了現實。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心靈卻格外溫暖。每一念及，感激之情，歷久彌新。

「大雜院」沒住多久，我得到國科會的資助，到英國作訪問學者兩年。回來後，兩年前由外文系王文興先生領銜，文學院中文系、哲學系幾位副教授共同發起的要求校方解決年輕教員眷舍問題的提案，經教育部專案撥款而建的位在舟山路共七棟五十六戶的公寓宿舍，這時正好落成，我抽中四樓的一戶，三房二廳約三十四坪（包括前後陽臺）。不久，張先生則以分期付款購入由臺大與行政院住輔會合建的位於溫州街的公寓，四房二廳。此後，我們兩家便一住四十年，一北一南，相距

數公里，再沒有搬遷過。

當自己還是講師、副教授的時候，總是羨慕升上教授級的得以免除升等的壓力，可以自由地看書、研究。等自己升了教授之後，才知道那是一廂情願的想像。臺大中文系早期是研究生與大學生合在一起上課，並無專設的研究所課程。後來研究所的課程與大學部徹底分開後，需要增開的課愈來愈多，教授們開課備課的負擔便愈來愈重。而指導的研究生，其論文完成的時間又愈拖愈長，碩士班應三年畢業，往往拖到五六年；博士班應四五年畢業，往往拖到七八年，甚至還有九年十年的，如此對指導教授的壓力更是不輕。當時同系的人相見，不是開系務會議時，便是在餐聚時，偶爾也有登門拜訪的。而我常去串門的兩家，一為臺老師家，一是張先生家。

臺老師上課時和喝酒時判若兩人，這是大家熟知的。而跟他聊天，也是與上課時判若兩人。上課時規規矩矩從不說一句閒話的他，聊起天來可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話題非常之廣。每次在他的書房兼客廳坐下來，他總是先問：「最近有何新聞？」有時我才報告幾句，他便笑起來，這表示此事他已知道，我只好換個話題，或等候他的開場。說掌故，談人物，論時事，是談話中少不了的。若是來客中有知書識畫的，他興致一來，還會從隔壁臥室中搬出一兩件書畫珍品供大家賞樂。他評人論事，格局宏大，完全超越政治利害的黨派觀點，而從歷史文化的大是大非以及個人的品格操守上著眼，對於不學有術的自私權貴，或是諂媚攀附權貴的文人學者，他常不假辭色，罵這一類人為「市儈」、「下流」、「無恥」等等，常令聽者有既傳神又痛快之感。他不以成敗論人，而是看這人行事是為公還是為私，是出於真心還是假意。像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來到江津，住到老友鄧初（仲純）開的醫院裏，受他的照顧。當臺老師意外地見到陳獨秀，驚喜無比，彌補了他當年去北大晚了幾年，未當成陳獨秀的學生之遺憾。陳獨秀既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並因發傳單而被北洋軍閥逮捕下獄，後又因路線之爭被共產黨掃地出門，最後還被國民黨判刑下獄關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國共宣布聯合抗日後，才被釋放出來，從南京來到重慶，再從重慶來到江津。這位哪裏都容不下的政治犯，臺老師對他卻非常尊敬，執禮甚恭，與父親臺佛岑老先生一起邀他到下游白沙的家中住了幾天，讓陳獨秀留下許多首詩的墨寶，還有兩副四尺長的立軸。此後，陳獨秀便因極為信任臺老師的關係，將正在撰寫的為小學老師如何有系統教學童識字的一本書稿《小學識字教本》，決定賣給臺老師所在的機構國立編譯館。舉

凡原稿的改正，參考書的商借，與館方的接洽，乃至搬家買家具等種種瑣事，陳獨秀都寫信給臺老師交代辦理。如今這一百多封信，連同二十幾首詩的墨寶，兩副立軸，以及一篇僅有兩章的手書自傳，都成了舉世無雙的文化遺產，成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並由中研院文哲所於一九九六年影印出版問世。在臺老師逝世前一年，正要從舊家溫州街十八巷六號搬去二十五號新家之前不久，有一次竟突然在書房裏跟我談起他如何在江津見到陳獨秀，陳獨秀又如何帶他去見民國後安徽都督柏文蔚的故事。過不久，同樣的內容，他又跟我說了一次。等他逝世後的第二天，即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日，《聯合報》副刊上赫然登出他的遺作〈「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前面五分之一篇幅的內容，竟然跟告訴我的一模一樣！後面的部分，臺老師則以陳獨秀與蘇曼殊、沈尹默、章士釗等人的交誼，來對比、映襯出陳獨秀的性情，詩藝與書藝的功力，以及始終如一的理想追求，最後還談到他鞠躬盡瘁，僅完成十分之八九便去世的《小學識字教本》，而以「仲老在《新青年》時代摧腐推新，晚年猶為下一代著想，如此精神，能不令人感激？」來總結其一生。此與陳獨秀自撰的聯語「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正可相互映發。

張先生於公開場合很少發言，一旦發言，往往頗具分量。他看起來外表冷峻，不苟言笑，內心卻是古道熱腸。在私下，張先生甚是健談，古往今來，無所不談。學風的良莠，社會的盛衰，時局的明暗，人物的臧否，都是經常談論的話題。在臧否人物方面，經常在一起談論的彭先生，以其女性的敏銳直覺，其鐵口直斷，有時會令張先生和我兩個男子漢為之驚歎。張先生一面是古道熱腸，一面也嫉惡如仇，對不公不義的事，不只是皮裏陽秋，有時也怫然作色。其進退辭受，頗似朱熹弟子黃幹在所撰〈朱子行狀〉中對乃師的形容：「謹難進之禮」、「勵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徇俗以苟安」、「故其於世動輒齟齬」。張先生在進退上，也是個「難進易退」的人；在辭受上，也是個「不貶道」、「不徇俗」的人。如此「與世動輒齟齬」，自所不免。他自知與朱子都是剛直狷介的人，都抱有天下為公的理想，與天下為私的政治現實格格不入，若欲有益於世、有利於人，只能在建立精神世界方面作出努力。因此他深研歷代聖賢博大精深的思想，旁通興發感動、元氣淋漓的文學，所撰《思文之際論集》，正是他畢生努力的重要成果，不僅融會了思想與文學兩界，而且貫通了古今文化的精神血脈。其中尤以〈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一篇中所揭舉的「道統」內涵，最是畫龍點睛之處。張先生深知「道

統」觀念早已被扭曲利用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且在清末以來反傳統高張的風氣下，「道統已是一個瀕於死亡的語言，幾乎成為保守、僵化和陳腐的同義語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張先生竟挺身而出，不但為「道統」辯護，而且還將「建立道統」作為朱子畢生的志業，而探索其深遠的意義。這除了基於學術的真誠，在大是大非上不容扭曲誤導、積非成是的義憤外，還有張先生自己所持守的信念與生命的激情寄託其中，不可不察。

在朱子建立其道統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爭議，張先生的大文中認為朱子最大的論敵，一為陸九淵，一為陳亮。並說朱陸之爭，乃道統內部之爭，二人皆以「傳堯舜之道，續孔子之統」為儒者最大使命，所爭者乃在於道統的內涵以及傳繼的人選上；朱陳之爭乃道統與非道統之間的論辯。陳亮重事功，不以帝王總天下於一姓之私為非；朱熹則諄諄勸帝王存天理，棄人欲；要人主正其心，不可起私心、用私人、積私財，以達到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也許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會將朱子看成道貌岸然的理學家，殊不知他和辛棄疾、陸游等人，都是熱血男兒，憂國憂民，主戰反和。在他三十三歲之年所寫的〈壬午年應詔上封事〉中，毫不顧忌地抨擊主和派說：「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然而主和派在朝廷中已是盤根錯節，豈是幾個熱血青年所能動搖的？曾經是「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的辛棄疾，親率數千兵馬自山東南下歸順南宋，渡江後曾上〈美芹十論〉暢論治軍理財準備北伐的大計，竟落得「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的歎息。辛棄疾除了做幾任地方官，賦閒在家幾達二十年之久！陸游自知生前無望，而將統一之夢寄於死後，所謂「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結果卻適得其反，是南宋被蒙元統一了！對一個自私、懦弱，只圖苟安、坐享榮華的朝廷，能有什麼指望？朱熹之所以「難進易退」、「不敢萌仕進意」，而一心致力於道統的建立，其故當在於此。

道統的傳繼，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到孟子，多無異議。孟子以後的傳繼，則頗有爭論。朱子是將周敦頤、二程、邵雍、張載、司馬光、李侗（朱子師）等均列為孟子之後道統的傳繼者，見〈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文集》卷八十六）。他的弟子黃幹便將後四人略過，而以朱熹上接二程。如此則偏於以哲學思想的層面來理解道統的意義，忽視了朱子的道統觀裏蘊涵著他極關注的政治理念，以及殊轍同歸的包容性及開放性。張先生以為「他雖是意在尊師，卻不知反而悖離了其師的理念」。然而這種較狹的理念在後世卻大行

其道，朱子的本意反而晦而不彰。元朝以後朱子之學成了官學，朱子的「道統」本意，受到更大的扭曲。張先生在文中說道：「專制統治者為維護其政權的合法性，把道統意識形態化，突顯它的正統性和權威性，使朱子的道統觀受到極大的扭曲和傷害，特別是其中涵蘊的政治理念與對現實的批評態度，完全被故意忽視。」朱子所建立的「道統」是作為理想政治的指導原則，而不僅僅是哲學思想及個人進德之途。道統的位階實在政統之上，其深遠的意義則如張先生所說：「有意在現實政治之外，建立起一個精神王國來。歷代賢聖傳繼此統，實為人精神命脈之所寄，也是使人道不息的價值所在。退一步而言，在現實的專制政體之下，人固無所逃命於天地之間，道統就成為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力量。」當道統一詞久受嚴重扭曲傷害之後，「幾乎成為保守、僵化和陳腐的同義語了」，張先生乃挺身而出，深掘細探，在朱子各種著作中「因其語而得其心」，既還原了朱子建立道統的用心，也寄託了自己的價值信念與生命激情，其撥亂反正之功，寄寓深長之意，是不能忘記的。

在該文之末，張先生更引到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以「儒者之統」來指謂「道統」的用法，將「儒者之統」視為一個整體，而不去辯爭誰是傳繼者，只要是「能自立其綱維」、「師表人倫」的儒者，皆得以入此統中；或是「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均見卷十五「宋文帝條」）的人，皆可稱為存道之人。王夫之將「養道自珍」者皆納入道統之中，既大大擴充了道統的陣容，又鼓舞了道統的生命之縣縣不絕，因為「養道以自珍」者無代無之。雖然為數也許不多，以至令人有「今之君子，講學而不修德」之歎，然而仍然縣縣不絕，卻也是實情，否則也就不會有張先生這篇宏文之問世了。王夫之以「儒者之統」代稱「道統」，也許更為通達。

從「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的人物特質中，我立刻想到了陶淵明。於是張先生在病床上說他想對陶詩作深入研究的淡定神情，為什麼會讓我感覺到是一種境界，便不難明白了。至於又覺得是一道既有些熟悉又有些模糊的風景，也藉著拜讀他的宏文而豁然開朗起來，而喃喃輕吟起白居易〈憶江南〉小詞中的一句：「風景舊曾諳」。

想起張先生的熱情好客，對我的照顧提攜，以及那一段窮開心的歲月中的往事，如今「舊事已無人共說」（陸游〈蜀漢〉詩句），能不傷感？想起張先生「養道自珍」的人格，想起他斟酌西學以融會詮解經典的講學和著作，想起他對學生的精神啟發與鼓舞，「儒者之統」將因他的提振而更加縣縣不絕，又深懷感激。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懷念張亨教授

鄭清茂*

友誼有好多種：密友、盟友、學友、畏友、益三友、酒肉朋友等等。

張亨教授是我的畏友。我們是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的同期同學。一九五九年畢業，他留在臺大中文系當講師，我則服了預備軍官役兩年後，也有幸被召回臺大擔任教職。因為當年中文系沒有職缺，正好有一位日本教授要來臺大講授一學年的日本史，需要一個隨堂翻譯，系主任臺靜農先生就跟歷史學系商量，叫我當兩系的合聘講師。於是我跟張亨老師也從同學變成同事了。

張老師大我兩歲，高挑個子，典型北方大帥哥；而且一副謙謙君子、老成而矜持的模樣。由於研究的興趣不盡相同，所以在學期間只能算是點頭之交，很少私下往來。後來僑居海外，有兩三次機緣，濫竽充數，回臺大中文系客座，講授日本漢文學；然後，落葉歸根，返臺定居十多年，這才與張老師與彭毅教授（我們稱她彭大姐）夫婦有比較多的往來。但我不住臺北，先在花蓮，後遷桃園。彼此年紀大了，都懶得動了。每年也只有兩三次相聚，偶而打打電話，互通消息或彼此問候而已。可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然而，我對這位學長的欽慕敬畏，卻無時或已。

張老師除了在教室裏傳道授業解惑，不遺餘力之外，更是一位真正做研究的學者。他的研究業績，以目前學界的標準而言，並不算多產，但是拜讀他收在《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中的近二十篇論文，每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言之有物之作，不是為了趕時髦，也不是為了升等或申請獎助而寫。我個人在治學上，一向隨興浪跡慣了，可說雜而不精、一無專長。所以不敢也不宜對張老師的學術成就說三道四，不過仔細看他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可謂遠承傳統而不泥於古，廣採現代而能為我用，是以不管論「思」談「文」解「詩」，總是引證周延、闡析緻密、語

* 鄭清茂，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榮譽教授。

感犀利，行文雅潔；而且往往能在人所忽略處，站在新的觀點，發掘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解釋。令人耳目一新，禁不住發出做真學問當如斯也的感嘆。

其實，我之所以敬畏張老師，不止因為他是一位好老師好學者，更由於他為人處事的風範。我說敬畏，並不是說他讓人敬而遠之；正相反，只要與他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雖然不苟言笑，卻是一位待人以誠、藹然可親的長輩。偶而還會聽到他含蓄的幽默而不覺莞爾。他的處世態度是：守正不阿、不伎不求、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窮究孔孟之說，卻絕不求聞達於人世；逍遙老莊之道，而常懷抱人道的關懷。這正是不偏不倚的研究態度，也是我這個小學弟欽佩這位大學長的地方。

寫到這裏，忽然驚覺張老師走了，無緣再見面了。本來還想舉一些張老師處世的典範事例，但也忽然覺得無此必要了。其實，只要接觸過張老師的人，應該都有各自值得懷念的經驗或故事。我在這裏只能說：「張亨啊，諸事無常，你辛苦了。希望來世再作你的同學、同事或學弟。如果有來世的話。」

※ 張亨教授紀念專輯 ※

重讀張亨《荀子假借字譜》

鄭錦全*

張亨、彭毅夫婦是我和妻子梁慕琴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求學時的學長，當時他們在生活上照顧我，還引我閱讀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張亨只是偶爾談到古書假借字研究，他和董同龢老師常討論古音問題。我一九六三年到美國求學後，才知道《荀子假借字譜》本來是他在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的論文，一九六三年臺灣大學文學院收入為文史叢刊之四，一九六五年再版，我後來也在圖書館裏瀏覽過，只可惜沒有仔細閱讀。之後，我們友誼互動多於學術交流。一九六七至六九那兩年我在哈佛大學教書，一九六八年張亨到哈佛當訪問學人，住的地方離我家不遠。有一晚我們夫妻有事外出，臨時找不到校園的女生來家裏照顧不到三歲的女兒阿蹦。平常阿蹦跟張亨很要好，我們就請他勉為其難，來家裏當一晚保姆。那晚我們回到家時，就依照請女生來看孩子的慣例，硬塞給他幾塊美元當酬勞。從此以後我們回到臺北見面，每次一起出外用餐，幾乎都是他付賬，如果我敢反對，他們夫妻就聯合起來重提那保姆費，來警告我又要犯錯了。

今(2016)年四月下旬，我回到臺北，彭毅說張亨身體欠安，不要見面，免得互相感染。我只好寄望以後相見，就回美國了。五月十九日，彭毅來電話說以後再也見不到張亨了，聞後驚痛失聲。我們六月底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在院裏的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找他的著作聊寄哀思，他這本《荀子假借字譜》已經被借閱多次，從書脊的樣子，可以看出多人使用過。對我來說，這本書最引人入勝的是細密嚴謹的論證，他的看法是，假借字的判斷是音同或音近，還要有被使用過當作假借字的例證。他以這個觀點出發，討論了不少包括清代學者所提出的假借字的判定與解釋。

* 鄭錦全，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七月中我要回美國伊利諾時，很不捨得把書還給圖書館。回到家後，在網上查伊利諾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竟然有張亨這本書，趕快奔去借出來。拿到書時，更有一番感觸。這是圖書館精裝的，封面和內容都很乾淨。仔細翻閱，引人入勝的是字譜列出所有《荀子》裏的假借字。用董同龢老師的《上古音韻表稿》的上古音構擬標出每個假借字的語音共一〇四〇條，其中聲韻完全相同的有六九〇餘條，占全數的三分之二；韻部全同、聲母大類相同的共一三三條；韻部相同、聲母發音部位鄰近的共十八條；韻部全同、聲母不合諧聲通則的共四十三條；剩下的其他語音配合情況比較難以分類說明的共有一五六條。總之，一〇四〇條假借中有八八四條的語音相同或非常接近。

從他全書的資料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假借字是文字繁衍的途徑，而基本的內容是語音，語音的結構形成語言的符號，人對語音符號的操弄有其限制，不能無限增加。但是世事繁多，書寫的符號因此增多，所以世界上每個語言都有同音異義字，例如英文的 **bank**，至少有「銀行」和「河岸」兩個意思，發音相同。古漢語的「然」本來是「燒」的意思，因為發音的關係，也經過假借負起「對」、「如此」等語義，後來又創出「燃」來當「燒」。漢字自古就這樣繁衍，累積到現在接近十萬字，但是一般人們所用的只有數千字而已。十幾年前我還檢查二十五史每一部史書所用的漢字，不管各書的總字數是幾十萬到幾百萬，漢字的種類，或稱詞種，數目都不超過八千。英文書也是一樣，每部書的英文字刪除語形變化後，所得的詞種數目也不超過八千。所以我自問：「學海無涯」，那麼詞語數目的涯邊盡頭在哪裏？我提出「詞涯八千」來回答。現在看了張亨的書，也許應該再認真思考措辭，我想說的是，一個語言的語音構成的語音符號的數目是有限的，不會任意增加。但是書寫的文字符號可以擴充，造成一個語音符號如果代表不同的意思，可以寫成不同的書寫符號。

重讀張亨的書，讓我自己澄清了對人類語言符號認知的理念，同時也讓我重溫過去跟張亨在一起的日子。我從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借出來的這本《荀子假借字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到期。雖然這次我已經細讀過了，還是留在我書桌上，直到圖書館通知有別人要借閱或期限已到，才還回去吧！